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精炼中译本）

Why Nations Fail

Acemoglu

版本：1.0

日期：2025 年 11 月 11 日

目录

第零章 前言：埃及人为何走上解放广场	1
第一章 如此接近，却如此不同	4
第二章 那些行不通的理论	13
第三章 繁荣与贫困的生成	18
第四章 细微差异与关键节点	23
第五章 我见过的未来——它行不通	28
第六章 渐行渐远	32
第七章 转折点	37
第八章 别想在我的地盘上发展	41
第九章 发展的逆转	45
第十章 繁荣的扩散	49
第十一章 良性循环	53
第十二章 恶性循环	57
第十三章 当今国家为何失败	61
第十四章 打破旧格局	65
第十五章 理解繁荣与贫困	69
附录 A 附录：制度、历史与发展的再思考	73

第0章

前言：埃及人为何走上解放广场

导言

本书探讨的是全球各国在收入与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美国、英国、德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与南亚那些贫穷的国家？

我们在撰写此书时，北非与中东正被“阿拉伯之春”所震动。这场革命始于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那是一场由民众愤怒引发的茉莉花革命。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迫下台，但民众的革命激情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迅速蔓延至整个中东。统治埃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在2011年2月11日被迫下台。当我们完成这篇前言时，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政权命运仍未可知。

埃及的贫困与政治根源

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根源在于贫穷。埃及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约12%，平均寿命短十年；2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尽管这一差距已经很大，但与朝鲜、塞拉利昂或津巴布韦等最贫穷国家相比，埃及的贫困程度仍属轻微——这些国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都陷于贫困。

为什么埃及如此贫穷？又是什么力量束缚了他们迈向繁荣？这种贫困是命中注定的吗？还是可以改变？

一个自然的起点，是倾听埃及人自己的声音。开罗塔利尔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示威者们说得很清楚：广告公司职员诺哈·哈迈德（Noha Hamed，24岁）说：“我们受够了腐败、压迫与糟糕的教育。我们生活在一个腐朽的体制中——它必须改变。”药学生穆萨布·艾尔·沙米（Mosaab El Shami，20岁）则说：“我希望在今年结束前，我们能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实现普遍自由，结束腐败。”

他们一致指责政府的腐败、服务无能与机会不平等，尤其谴责政治压制与公民权的缺失。正如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在推特上写道：“突尼斯：压迫 + 社会不公 + 缺乏和平变革的渠道 = 一颗定时炸弹。”

埃及人和突尼斯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经济问题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所有阻碍他们创造繁荣的经济障碍，都源于政治权力被少数精英垄断。这正是他们认为必须首先改变的。

学术界的误区

然而，他们的理解与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迥然不同。传统观点认为，贫穷主要来自地理、文化或政策失误。

- 有人强调地理决定论——埃及地处沙漠，降雨稀少，土壤与气候不适于农业，因此难以富裕；
- 有人强调文化论——认为埃及人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不利于经济发展；
- 还有人认为是“政策错误”——统治者只要采纳正确的建议，就能带来繁荣。

在这些解释中，统治精英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攫取财富，似乎与经济困境无关。

本书的核心论点

本书的立场与塔利尔广场上的抗议者一致。我们认为，埃及之所以贫穷，正是因为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将整个社会组织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构。穆巴拉克家族积累的财富据称高达 700 亿美元，而普通埃及人却是这场体制的输家。

事实上，这种解释不仅适用于埃及，也适用于朝鲜、塞拉利昂、津巴布韦等其他贫穷国家。相反，像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曾推翻垄断权力的精英，建立了权力分散、政府负责任、机会平等的社会。我们将展示：要理解当今世界的的不平等，必须追溯历史，理解制度如何沿政治冲突演化。

例如，英国在 1688 年通过“光荣革命”改变了政治制度，从而孕育了工业革命。相较之下，埃及在奥斯曼统治、法国入侵、英国殖民乃至 1952 年推翻君主制后，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转型。每一次“革命”，都只是新的精英取代旧的精英。

制度与历史的循环

本书将分析这些制度性模式如何自我复制，以及何时会被打破——如 1688 年的英国、1789 年的法国，以及后来实现制度变革的日本、博茨瓦纳和巴西。

只有当政治权力广泛分布、普通民众获得真正的政治参与权时，一个社会才可能走上繁荣之路。

正如一位埃及示威者雷达·梅特瓦利（Reda Metwaly）所说：“现在你能看到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一起，老人与年轻人并肩，他们都渴望同一件事。”这种跨阶层的联合，正是历史上成功的政治变革的关键特征。

译者说明与术语注解

- “包容性制度” (inclusive institutions)：指政治与经济权力广泛分布、保障产权与机会平等的制度结构。
- “汲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指少数精英利用权力汲取资源、排斥他人参与的制度体系。
- 本章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是决定经济繁荣的根源性变量。**

小结

埃及的贫困，不是命运或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真正的繁荣始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当政治被少数人控制时，经济也必然被锁在贫困之中；当权力被广泛分享时，社会才可能释放创造力与财富潜能。

第1章

如此接近，却如此不同

里奥格兰德河的经济学区

诺加莱斯（Nogales）这座城市被一道围栏一分为二。若你站在围栏旁向北望，可以看到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它位于圣克鲁兹县（Santa Cruz County）。当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约为三万美元。大多数青少年在校学习，大多数成年人都拥有高中学历。尽管人们常批评美国医疗体系效率不高，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居民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平均寿命较高。许多居民年过六十五岁，可以享受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除此之外，他们还理所当然地享有一系列公共服务——自来水、电力、电话、下水道系统、公共卫生、道路网络以及治安。居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担心人身安全，也不必时刻提防盗窃或征收掠夺，他们的投资、住房和商业都有稳定的预期。更重要的是，诺加莱斯（亚利桑那）的居民认为政府是他们的代理人；即便政府偶有低效或腐败，他们也可以通过选票更换市长、议员乃至总统。民主在这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围栏的另一边，生活却大不相同。南部的诺加莱斯（索诺拉州，Sonora）虽然属于墨西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其家庭平均收入仅为北部的三分之一。大多数成年人没有高中学历，许多青少年辍学。母亲们要为婴儿高死亡率而忧虑。公共卫生条件差，居民的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北方邻居。道路年久失修，治安更为糟糕，犯罪率高企。开办企业不仅要防盗抢，还得应付繁琐的许可与贿赂程序。人们每天都在与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共处。

与北方居民相比，民主对他们来说是近二十年的新鲜事。直到 2000 年政治改革之前，诺加莱斯（索诺拉）和墨西哥其他地区一样，一直处于“制度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的长期控制之下。

同一城市的两种命运

这两个本质上是同一城市的部分，为何会如此不同？并非因为地理、气候或疾病环境——病毒并不会在边界前止步。健康差异源于卫生和医疗条件的差距，而非自然环境。那是否是居民不同？北方的居民是否主要是欧洲移民后裔，而南方的是印第安人后代？

事实并非如此。两地居民血统相近。1821 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后，整个“两个诺加莱斯”地区都属于旧加利福尼亚（Vieja California）州。直到 1846-1848 年的美墨战争之后，美国才吞并这片土地，并在 1853 年通过“加兹登购地案”（Gadsden Purchase）正式划定边界。当时的测量官米克勒中尉（Lieutenant N. Michler）在勘界时写道：“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山谷，名叫洛斯·诺加莱斯（Los Nogales）。”两座城市自此分别在边界两侧成长起来。两地居民祖先相同，吃同样的食物，听同样的音乐，文化也相似。

显然，最简单也最关键的区分，正是那条边界。诺加莱斯（亚利桑那）属于美国，其居民受益于美国的经济制度——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接受教育，雇主愿意投资先进技术，从而带来更高的工资。同时，他们享有民主政治制度，可以选举并监督代表，若政客腐败无能，便可通过选票将其罢免。政治家因此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卫生、道路、治安——这些都是公民要求的。而诺加莱斯（索诺拉）的居民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之下。不同的制度塑造了不同的激励机制，进而导致两地企业家与劳动者的行为迥异。这些制度差异，正是围栏两侧经济繁荣差距的根本原因。

制度差异的起源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更有利于经济成功？答案要追溯至殖民时期。北美与拉丁美洲在早期殖民阶段经历了根本性的制度分化（institutional divergence），并延续至今。要理解这场分化，我们必须回到殖民地的起点——从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谈起。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立

1516 年初，西班牙航海家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Juan Díaz de Solís）驶入南美洲东岸一片宽阔的河口。他登陆后为西班牙宣称主权，并将这条河命名为“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意为“银之河”，因为当地人手中拥有银器。河口两岸居住着查鲁亚人（Charrúas，今乌拉圭）和克兰迪人（Querandí，今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区）。他们是没有中央集权结构的游猎部落，对外来者怀有敌意。索利斯登陆不久便被一支查鲁亚族队伍击毙。

1534 年，西班牙人仍心怀希望，派遣新的殖民队伍，由佩德罗·德·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率领，在今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殖民据点。这里气候温和、风景宜人，名副其实“好空气”（Buenos Aires）。然而殖民者很快失望：他们寻找的不是好空气，而是可供掠夺的财富与可供役使的劳力。查鲁亚人与克兰迪人既不提供食物，也拒绝劳动，甚至袭击殖民点。殖民者饥饿难耐，因为他们从未打算自给自足。当地既无金银矿藏，也无顺从的劳动力——索利斯当年看到的银器其实来自远在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

殖民者被迫四处寻找更富庶的地方。1537 年，胡安·德·阿约拉斯（Juan de Ayolas）率队沿巴拉那河（Paraná River）上行，企图打通通往印加的路线。在途中，他们遇到了瓜拉尼人（Guaraní），一个以种植玉米和木薯为主的定居农业部落。阿约拉斯立刻意识到：与查鲁亚和克兰迪不同，瓜拉尼人更适合被征服。短暂冲突后，西班牙人获胜，并

在此建立了城镇——“阿松森圣母城”（Nuestra Señora de Santa María de la Asunción），即今日巴拉圭首都。征服者们娶了瓜拉尼贵族的女儿，成为新的统治阶层，沿用原有的贡赋与强迫劳动制度，只是换了主人。这才是他们想要的殖民模式。四年后，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彻底放弃，殖民者全部迁往阿松森。

今日人们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南美的巴黎”，一座因潘帕斯草原财富而兴起的优雅城市。然而，最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所以被遗弃，揭示了欧洲殖民的逻辑：早期的西班牙乃至后来英国殖民者，并不打算亲自耕种土地——他们要的是掠夺与强制劳动。

从卡哈马卡开始（From Cajamarca …）

索利斯、门多萨与阿约拉斯的远征，紧随哥伦布 1492 年发现巴哈马群岛之后展开。西班牙在美洲的扩张真正开始于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于 1519 年征服墨西哥，以及十五年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远征秘鲁，随后便是门多萨前往拉普拉塔河的探险。此后一世纪间，西班牙征服并殖民了中南美洲的大片土地，葡萄牙则占据了巴西。

西班牙的殖民策略十分高效。科尔特斯首先在墨西哥试验出一种模式：俘获当地首领，掌控其财富，并通过其地位迫使原居民臣服与纳贡。这使西班牙人得以继承原有的税收与强制劳动体系，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1519 年 11 月 8 日，科尔特斯率军进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皇帝蒙特祖马（Moctezuma）尽管顾问反对，仍选择和平迎接西班牙人。随后发生的事，见于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于 1545 年后编纂的《佛罗伦萨手抄本》（Florentine Codices）：

“西班牙人立刻逮捕了蒙特祖马……随即炮声震天，恐惧笼罩全城，仿佛每个人都吞下了自己的心……天亮后，他们要求一切贡品：白玉米饼、烤火鸡、鸡蛋、清水、木柴、炭火……蒙特祖马照办。

当西班牙人安顿好后，他们询问蒙特祖马城中宝藏所在，并在他的带领下，取走羽冠、金盾、金环、脚镯、臂环、头饰——凡是黄金之物，尽皆焚化冶炼成条。西班牙人走遍全城，凡见有价值者，皆占为己有。”

1521 年，阿兹特克帝国被彻底征服。科尔特斯出任新西班牙（New Spain）总督，随即推行一种核心制度——“恩科米恩达制”（encomienda）。

恩科米恩达制（Encomienda）

“恩科米恩达”最早出现在 15 世纪西班牙本土的收复战争中，当时是授予士兵以土地与附庸的权利。然而在新大陆，它变得更加残酷：国王将一定数量的原住民“授予”征服者（称为 encomendero），这些人必须向 encomendero 缴纳贡赋与劳役，而后者只需名义上负责他们的基督教化。

关于该制度的残酷，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多米尼加修士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他 1502 年随总督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多米尼加），亲眼目睹了对原住民的暴行。1513 年他作为随军神父参与征服古巴，甚至获赐恩科米恩达封地，但很快弃官，从此投身反殖民斗争。他 1542 年撰写《印度毁灭简史》（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痛陈殖民制度的野蛮：

“每个殖民者都占据一座城镇（法律称之为‘被托付’，encomended），强迫居民为自己劳动，掠夺他们原本稀少的食物，占有他们耕作的土地。无论尊贵者、老人、妇女或儿童，皆被视作奴仆，日夜劳作，无休无息。”

在征服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的记述中，拉斯·卡萨斯写道：

“西班牙人一如既往地瓜分土地与居民，然后将其视作奴隶。远征指挥官俘虏了该地国王波哥大（Bogotá），为求黄金与宝石，将其囚禁半年。国王惶恐不安，许诺用黄金填满一座屋子换取自由。臣民四处搜集黄金，仍未达标。西班牙人便以违约为名判他受刑——绞刑、火烛灼足、铁环缚颈，直至他痛苦而死。”

这种“征服与掠夺”的模式，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秘鲁进一步发扬。

皮萨罗与印加的征服

1531 年，皮萨罗率军进军印加帝国。当时印加正经历王位内乱——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击败兄弟瓦斯卡尔（Huáscar），成为唯一统治者。1532 年 11 月 15 日，皮萨罗抵达卡哈马卡（Cajamarca），诱捕阿塔瓦尔帕。史载其手下屠杀印加随从逾两千人，囚禁皇帝，以其自由为筹码勒索黄金——一间屋子装满黄金，两间装满白银。阿塔瓦尔帕履约后仍被勒死。次年 11 月，西班牙军攻占印加首都库斯科（Cusco），屠戮贵族，焚毁“太阳神庙”（Temple of the Sun），熔化金饰铸成银条。

在秘鲁，与墨西哥一样，印第安人被划入恩科米恩达体系，每个征服者获得一批劳动力。此时，一个新的制度出现——米塔制（mita）。

波托西的米塔制（The Potosí mita）

1545 年，一名叫迭戈·瓜尔帕（Diego Gualpa）的当地人，在今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中寻找圣地时，偶然发现了一座“银山”（El Cerro Rico）。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波托西（Potosí）银矿。到 1650 年，波托西人口达 16 万，超过当时的里斯本或威尼斯。

为了满足矿山的劳力需求，西班牙派遣新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赴任秘鲁（1569 年），专责“解决劳工问题”。他先巡视五年，并命人进行全国人口普查。随后推行两项措施：

1. 人口集中制 (reducciones)：强制迁移印第安人，集中至新建城镇，便于征税与征劳。2. 米塔劳役制 (mita)：改造印加传统的“轮值劳役制”（意为“轮班”），扩大规模。按照托莱多的规定，广阔的征募区从今秘鲁中部延伸至大部分玻利维亚，面积逾二十万平方英里。每七名成年男子中须有一人被征发前往波托西矿山服役。

波托西米塔制贯穿整个殖民时期，直至 1825 年才废止。其范围几乎完全覆盖了印加帝国的核心地区（首都库斯科一带）。

米塔制的遗产

令人惊讶的是，米塔制度的影响至今仍在。以秘鲁的卡尔卡省 (Calca) 与邻近的阿科马约省 (Acomayo) 为例：两地同处安第斯高原，居民皆为印加后裔，语言相同，但阿科马约的居民人均消费仅为卡尔卡的三分之二。当地人也心知肚明——“这里比那边穷，为什么你还来？”他们指出，去卡尔卡的道路平整而铺装良好，而去阿科马约的路坑洼难行。卡尔卡农民能把作物卖到市场，而阿科马约人多为自给自足。这些差异的根源，不在地理，而在历史——阿科马约位于当年米塔征募区内，而卡尔卡不在其中。

强制与掠夺的网络

除米塔外，托莱多还推行了一系列压榨制度：

- 将恩科米恩达改为“人头税”，每名成年男子须以银币缴纳固定税额；
- 实行“货物分配制” (repartimiento de mercancías)，即强迫印第安人以高价购买西班牙商品；
- 推行“重负制” (trajin)，征用原住民代替牲畜搬运货物。

西班牙殖民世界到处建立了类似的体系：恩科米恩达、米塔、货物分配、劳役徭役……目的皆为压低原住民生活水平，榨取其全部剩余价值。

这种制度确实带来了巨额财富——王室财政充盈，征服者后裔富甲一方——但也让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财富的极度集中与劳工的极度贫困，消耗了社会的创造力，埋下长期发展的隐患。

前往詹姆斯敦 (To Jamestown ...)

西班牙在南美与墨西哥的征服极为成功，掠夺了无数黄金与白银。然而，英国人在北美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现实。

1607 年，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 (Jamestown) 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地。最初的定居者大多是绅士与工匠，他们的目标与西班牙人相同：寻找黄金与快速致富的机会。但北美的土地上既没有金银矿，也没有庞大的印第安王国可供征服。殖民者抵达

后发现，这里没有阿兹特克或印加式的国家，没有能被俘获的皇帝，也没有可以奴役的庞大劳动力。当地的波瓦坦（Powhatan）部落人口稀少，且善于抵抗。

殖民地的崩溃与饥荒

詹姆斯敦最初的两年几乎以灾难告终。1607 年至 1610 年间，抵达的约 500 名殖民者中有四分之三死于饥饿、疾病与冲突。史称“饥饿之冬”（Starving Time）。原因之一，是殖民者拒绝耕种——他们被授予股份与分红的承诺，却没有个人土地。根据“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章程，一切生产与收入归公司所有，由总督统一分配。

詹姆斯敦的早期总督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在 1610 年制定《弗吉尼亚法令》（Laws Divine, Moral and Martial），其中写道：

“任何人若偷窃公司财物、私自交易、拒绝劳动、亵渎上帝或批评政府，皆以死罪论处。”

即便如此，劳动力依然低效，人们消极怠工。缺乏激励，加上疾病肆虐，使殖民地几近灭亡。

私有土地与激励机制的诞生

1618 年，伦敦公司董事长埃德温·桑迪斯（Edwin Sandys）决定改革。新的“授地制”（headright system）规定：凡自费前往弗吉尼亚者，可获得 50 英亩土地；若携带仆役，每名仆役另奖 50 英亩。土地可继承、转让或出租。由此，殖民者首次拥有私人财产与收益权。

同时，公司还设立了“众议院”（House of Burgesses）——美洲第一个民选议会。各地自由民可选代表赴詹姆斯敦参与立法。1619 年，首届议会召开，讨论税收、土地分配、贸易等事务。

这种制度的结果立竿见影。私人耕作的生产率显著提高，粮食充足，殖民地开始稳定增长。1619 年同年，首批非洲奴隶抵达弗吉尼亚港口，成为未来三百年北美奴隶制度的开端。

英属殖民地的特征：自治与分权

虽然奴隶制度带来悲剧，但与西班牙殖民地相比，英属北美的制度更具包容性。原因在于：

- 殖民地没有可供掠夺的财富与帝国结构，迫使定居者自耕自食；
- 公司无力维持集权统治，只能授予土地与政治权；

- 大西洋的距离使英国王权难以直接控制殖民地事务；
- 迁往新大陆的群体多为宗教异议者与小业主，他们天然敌视贵族特权。

因此，北美殖民地自早期起便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与代议政治。弗吉尼亚众议院、马萨诸塞镇会议（Town Meetings）等机制，让殖民者逐渐习惯于自我治理。

这种政治结构虽然起初只是公司妥协的产物，但在历史上却奠定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根基。

包容性制度的起点

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制度是“汲取性的”（extractive）。在秘鲁与墨西哥，征服者建立了基于奴役与贡赋的等级体系；在北美，殖民者则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与代表制的体系。

包容性制度的核心，不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激励结构：人们拥有财产权、法律保障与政治参与权，从而愿意投资、创新与教育下一代。这些激励，正是詹姆斯敦改革的无心之果。

英格兰国内的变革背景

北美的包容性制度并非凭空产生。它反映了当时英格兰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17 世纪的英格兰正经历从封建等级向议会宪政的过渡——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博弈，为殖民地提供了思想与制度的模板。

1603 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王权日益专制，征税与宗教压迫引发贵族与市民的不满。1628 年，议会颁布《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限制国王征税权；1642 年爆发英国内战，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议会军击败国王查理一世并处决之。尽管克伦威尔后期专制，1688 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这一过程塑造了英国人对政府的根本看法：权力应受约束，税收需经代表同意，法律高于君主。这些观念随殖民者一同跨越大西洋，在新大陆扎根。

细微差异与关键节点

为什么英国殖民地与西班牙殖民地在同一大陆上，却走向如此不同的道路？地理条件相似，殖民者同属欧洲，宗教亦多为基督教；然而一个地区形成了包容性制度，另一个则被汲取性制度锁死。

我们认为，答案在于——早期制度的微小差异（smal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在历史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被放大，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轨迹。

制度的路径依赖

制度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一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与经济规则，会通过激励机制与利益结构自我延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一旦一个社会建立了允许少数人垄断权力与财富的制度，这些人便有强烈动机维护现状。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允许广泛的参与与财产权保护，公民就有能力捍卫这些权利，防止少数集团的篡夺。

这两种制度路径在关键历史时刻的反应截然不同。当外部冲击——战争、技术变革、贸易扩张——到来时，包容性社会倾向于吸收变化并强化自身；而汲取性社会则会利用变化进一步巩固特权。

黑死病：欧洲制度分化的关键节点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是一个典型的关键节点。1346 年至 1353 年间，瘟疫夺去了欧洲约三分之一人口。劳动力骤减，地租暴跌，工资上升。在这一巨变面前，不同地区的制度反应大相径庭。

在西欧，封建制度已开始松动。农民利用劳动力短缺的契机，争取到更高的工资与更自由的迁徙权。地主若想留住劳工，只能妥协。英格兰议会试图通过《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urers, 1351）限制工资上涨，但收效甚微。农民地位逐渐提升，最终在 1381 年爆发“瓦特·泰勒起义”（Wat Tyler's Peasants' Revolt），进一步推动封建关系解体。

相反，在东欧，封建领主势力强大，他们趁机强化对农民的束缚，扩大庄园规模，重新确立农奴制。这种“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使得波兰、匈牙利、普鲁士等地陷入更深的经济僵化。

于是，同样的外部冲击——黑死病——在不同制度下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后果：西欧的包容性上升，东欧的汲取性加深。这便是“关键节点放大机制”的典型例证。

大航海时代与新世界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进入大航海与海外扩张时代，这又是一次关键节点。海上贸易与殖民扩张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分配，取决于国内制度结构。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收益直接流入王室与少数贵族之手。黄金、白银、香料、糖与奴隶贸易使统治精英更加富裕，却几乎没有扩展经济活力。王权因财富而强化，政治更加集中。

相反，在英国与荷兰，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商人阶层凭借贸易致富，要求政治代表权。1600 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 1602 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均由私人股东组成，体现资本市场与商业自治的力量。海外贸易成为资产阶级挑战贵族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为后来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提供了物质支持。

光荣革命：制度转折点

1688 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是英国制度史的分水岭。詹姆斯二世试图恢复专制与宗教高压，引发贵族、商人、议会的联合反抗。威廉与玛丽登基后签署《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确立了议会至上、司法独立与纳税同意原则。

这场革命使英国从封建君主制转向宪政体制。其核心成果包括：

- 政府不得任意征税、剥夺财产；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国家借贷制度正规化（Bank of England 成立于 1694 年）；
- 财产权与契约得到稳定保障。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与巴里·韦因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其经典论文中指出：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安排，解决了政府对公民的“承诺可信性问题”（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即政府再也无法随意掠夺财富或违约。这一制度创新，为英国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关键节点的历史逻辑

关键节点的作用，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如何与既有制度互动。制度结构像一组“滤镜”，决定社会如何吸收外部冲击。——黑死病的冲击，强化了某些地区的包容性，却加深了另一些地区的剥削；——大航海时代的财富，使有的国家开放，有的国家僵化。

因此，历史并非由单一事件决定，而是由事件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制度演化逻辑”：初始差异 → 关键节点 → 路径分化 → 长期结果。

包容与汲取的延续

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制度差异不断被历史放大。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形成了包容性轨迹：法律制度健全、市场开放、政治参与逐步扩大；而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的殖民地，则陷入了长期的汲取性循环：权力集中、土地垄断、经济扭曲。

这就是为何，今天的美国与墨西哥——两座诺加莱斯的两端——在同一片土地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小结

历史不会重来。制度一旦确立，便通过激励机制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期望。当关键节点出现时，不同的制度会走出不同的未来。正如本章标题所示：如此接近，却如此不同。

第2章

那些行不通的理论

引子

本章要讨论的是几类在人们看来“很有道理”、也被学界和政策圈反复使用的解释世界贫富差距的理论——但我们认为，它们实际上都解释不了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些事实：为什么同一片土地上会有两个诺加莱斯，为什么朝鲜半岛会被一刀切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拉美和北美会走上两条路。

这些行不通的理论主要有三类：

1. 地理决定论 (the geography hypothesis)；
2. 文化假说 (the culture hypothesis)；
3. 无知假说 (the ignorance hypothesis)。

它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都给人一种“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直观感：有的地方太热、有的文化太懒、有的领导人不会搞经济。但如果把这些理论真拿去对照历史与现实，就会发现它们要么讲不通，要么讲不全，要么讲反了。

地理假说 (The Geography Hypothesis)

第一种广为流行的看法，是把贫困归因于地理环境：气候、疾病、土壤、纬度、接近海岸的程度等等。这一思路有很长的传统，现代最知名的版本可以在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 以及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2006) 关于地理与发展差异的论述中看到。
:contentReference[oaicite:0]index=0

在这种解释里，非洲之所以穷，是因为热带气候导致热病横行、作物产量低下；拉美之所以不如北美，是因为土壤和热带病；中东今天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如欧洲。

问题是，这种说法很难解释我们在美洲看到的“逆转”：1492年之前，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原显然比北美、阿根廷、智利一带要发达得多——有城市、有文字、有更高的技术和国家组织。但到了19世纪以后，恰恰是原来地理条件看似更一般的北美、南锥体地区（阿根廷、乌拉圭、智利）追了上来，而原来最繁荣的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反而落下去了。地理没变，变的是后来被强加上的制度。

同样，地理也不能解释中东的贫困。中东曾是新石器革命的发源地，最早的城镇出现在今伊拉克一带，铁器冶炼在今土耳其出现，中世纪时那里仍然技术领先。如果地理真的决定发展，中东本应一直领先。但事实是，后来是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其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才让这一地区在近代逐渐落在欧洲之后。也就是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地理，而是制度。

地理还解释不了另一类现象：为什么日本、后来再到中国，会在长期停滞之后进入快速增长？地理没有变，但制度和政策变了，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突然起飞”。

文化假说 (The Culture Hypothesis)

第二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是文化假说——把繁荣与否归因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宗教、伦理或“民族个性”。这一思路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断，后来的戴维·兰德斯 (David Landes, 1999)、塞缪尔·亨廷顿等人也都强调过文化在比较发展中的作用。

这套理论的现代版本听起来往往是这样：

- 非洲穷，是因为人们缺乏“现代工作伦理”，还相信巫术，对西方技术抵触；
- 拉美穷，是因为所谓的“伊比利亚文化”“mañana 文化”，讲究今天先开心、明天再说；
- 有人还认为，英国—盎格鲁文化本身就比较优越，所以英国殖民地后代更容易发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能解释部分现象，但一放到真正的历史与跨国比较中，就站不住了。

首先，看回诺加莱斯。边界北边和南边的人，语言、食物、音乐、宗教、生活方式几乎一样，只有在长期发展的结果上，才出现了“美国人更信任他人、墨西哥人更不信任”的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就是制度差异的产物，而不是原因。一个政府长期无法提供公正的司法、无法打击贩毒集团，人们当然会变得不信任别人；这不是文化天生如此。

再看朝鲜半岛。南韩今天是世界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北韓却饱受饥荒。难道是因为南北韩文化不同？显然不是，它们在分裂前有几乎完全一致的语言、血缘与文化传统。真正的分水岭是分治后的制度——南边是市场与民主，北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文化差异是结果，不是原因。

文化论还解释不了拉美内部的差异。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人口欧洲化程度，其实比美国 and 加拿大还高，可它们的长期经济表现却远远落后于后两者；智利和阿根廷又明显好于同时讲西班牙语、文化接近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若说是“拉美文化”或“西班牙文化”导致落后，就没法解释这种同文化区内部的差距。

同样，文化也解释不了东亚的腾飞。20 世纪前半叶，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长幼尊卑、讲人情面子这些东西“妨碍创新”，后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接力增长，这些说法又被倒过来解释成“其实是东亚文化好”。但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这些经济体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制度，放开了市场，建立了激励，而不是一夜之间“文化变勤奋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贫困，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而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种制度性灾难；改革之后的增长，也不是因为文化忽然开窍，而是因为邓小平及其盟友推翻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开始允许农业、再到工业使用市场化激励。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比如信任、合作的社会规范）确实重要，但它们本身又往往是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而那些通常被拿来解释贫困的宗教、民族性、所谓“拉美气质”“非洲气质”，并不能解释世界不平等的主要图景。

无知假说 (The Ignorance Hypothesis)

第三种很受欢迎、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和国际机构里最常见的解释，是无知假说：世界贫富差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尤其是穷国的统治者——不知道怎样把一个国家变富。只要给他们正确的经济学建议，教他们怎样消除市场失灵、怎样搞对宏观、怎样搞产业政策、怎样搞私有化，他们就能学会，国家就能富。

这一看法源自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设定。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在 1935 年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稀缺手段与多种用途之间作出选择的人的行为。沿着这条路走，很容易推导出：既然经济学能告诉我们怎样最优配置资源，那么穷国之所以穷，就是没掌握这些最优做法。只要掌握了，就能像富国一样。再加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市场能达到有效配置”，这就更让人觉得，只要排除市场失灵、执行正确政策，增长就会来。

听上去很合理，但问题在于：它解释不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大部分“糟糕政策”。以加纳独立后的经历为例：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政府大办国营工业，建了选址极差、上下游完全脱节的工厂，还在不产芒果的地方建芒果罐头厂，产量甚至超过世界需求——这一切很难说是因为没人提醒过他。政府里有英国经济学家 Tony Killick 这样的顾问，甚至还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的建议，他们都知道这些项目在经济上讲不通，但还是做了。原因不是“无知”，而是这些项目能创造政治支持、养活一批人、巩固一个不民主的政权。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1971 年的加纳总理科菲·布西亚 (Kofi Busia) 身上。他明知货币贬值是必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给了同样的建议，他也签了协议，但一旦执行，物价上涨、城市不满、骚乱爆发，最终他被推翻，新政权立刻把贬值撤回。这里的问题不是“他不知道贬值有好处”，而是政治制度不允许他付出这个政治代价。

这正是无知假说最大的漏洞：它假定统治者不知道正确政策，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知

道，但他们按自己政治利益行事；或者说，他们知道什么是“对国家好的”，但他们更在意“对自己保权有利的”。这一点，在后面我们会不断看到。无知假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带来一个很诱人的结论：既然是“不会”，那我们教他们就好了，可以靠技术性建议“工程式地制造繁荣”。但历史一次次证明，真正挡路的不是知识，而是政治。

为什么那些理论行不通

前面我们看到，加纳的恩克鲁玛与布西亚都并非无知，而是被他们身处的政治制度所限制。他们知道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却也知道那样做会失去政治权力。这类情形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许多贫穷国家之中。

掠夺型权力的理性

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行为者并非“无知”，而是“理性自利”的。统治者常常清楚地知道，开放竞争、保障产权、激励创新对经济有利——但他们更清楚，这样做会威胁他们的权力来源。

例如，若某个独裁者允许自由企业蓬勃发展，那么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富裕阶层；而这个阶层不再依赖政府恩惠，可能会要求政治改革。因此，从他们的视角看，**抑制增长是理性的政治选择**。他们宁可让国家穷一点，也不愿冒失去权力的风险。

这种“理性掠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西班牙在拉美建立恩科米恩达和米塔制度时，统治者当然知道强迫劳动和高税收会让生产低效；但他们仍坚持，因为那能让他们短期内获得最大政治与经济收益。几百年后，非洲的殖民统治者在撤离前也留下了类似的制度：把国家变成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机器。独立后的精英，只是换了面孔，继续操纵旧制度。

因此，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无知”，而是“谁有权力、他要干什么”。

为什么“技术援助”也失败

如果贫困的根源在政治制度，而不是知识匮乏，那么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机构主导的那些“发展项目”“结构调整”“能力建设”，为什么屡屡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计划假定：只要有专家给出合理建议，并辅以财政援助，落后国家就能“赶上”。然而，事实一再证明——当政治激励指向维持特权，而非改善公共利益时，任何外部“最佳实践”都无法持续。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非洲“结构调整计划”便是典型例子。国际机构要求各国削减财政赤字、私有化国企、放开贸易、稳定货币——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正确无误。但在现实中，这些改革常常被统治集团用于新的寻租渠道：国企被廉价卖给政客亲属，金融放开成了资本外逃，贸易自由化反而摧毁了本地制造业。政策并没有失败在“无知”，而是失败在**政治意愿与权力结构**。

用错误的理论得出错误的处方

无知假说还有一个危险后果：它为失败找借口。如果我们相信贫穷只是因为“他们不懂”，那么外部世界的任务就是“教他们”。这就延续了一种父权式的心态——认为发展可以被工程化，被“聪明的专家”规划出来。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变革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权力问题**。革命、改革、宪政、选举——这些都涉及社会力量的重新平衡。没有政治结构的改变，就没有经济命运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会看到一些国家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如韩国、台湾），而另一些国家即便接受了同样的专家建议，却始终停滞。

真正的问题：制度与权力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地理、文化、无知，都无法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它们或许能解释一些差异的表象，但不能解释持续性的繁荣与贫困。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

- 谁掌握权力；
- 权力能否受到约束；
- 普通人是否能影响决策；
- 经济激励是否开放给全体社会。

在包容性的制度中，权力受到限制，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和政治渠道追求自身利益；在汲取性的制度中，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排斥其他人。

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内容——从历史到现实，**制度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

小结

在结束本章时，让我们回顾三个主要观点：

1. 地理假说行不通，因为自然条件无法解释制度差异与历史逆转；
2. 文化假说行不通，因为价值观是制度的产物，而非原因；
3. 无知假说行不通，因为统治者往往明知正确之道，却出于政治动机选择错误。

因此，理解贫困与繁荣的关键，不是寻找“正确政策”，而是理解**权力与制度如何塑造激励结构**。这正是本书接下来的主题。

第3章

繁荣与贫困的生成

导言

如果地理、文化和无知都不能解释国家的繁荣与贫困，那么什么能？本章的核心命题是：**制度（institutions）决定经济命运。**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鼓励个人努力、创新与投资，因为它们保障产权、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赋予人们通过教育和职业选择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相反，汲取性的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则由少数人控制，他们利用制度掠夺多数人的财富与劳动成果，限制创新与机会。

同样地，经济制度背后也有其政治根基。政治制度决定了谁掌握权力、权力如何分配与约束，从而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会促成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一个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只会复制掠夺。

包容性与汲取性制度的定义

要理解这一逻辑，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包容性制度，什么是汲取性制度。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 保护私人产权，使人们可以安全地投资与积累；
- 提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让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与企业；
- 建立公共服务与法治体系，保障契约执行；
- 激励创新，允许新技术和新企业挑战旧势力；
- 通过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手段扩大机会。

这些制度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与企业精神。人们知道努力与创新可以改善生活，于是不断投资、改进、试验。历史上的英国、美国与近代的韩国、台湾，都属于包容性制度的典型。

与之相反，**汲取性的经济制度**由少数精英掌控：

- 产权不稳定，国家或统治者可随时没收财富；
- 市场被垄断，机会只对权贵开放；
- 政府为精英服务，税收被用作掠夺工具；
- 创新被压制，因为新技术可能威胁既得利益；
- 教育与社会流动被阻碍，权力与财富代际固化。

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会陷入一种“低激励陷阱”：多数人没有动力去提高生产率，而少数人只关心保持控制。结果是，增长停滞、贫困加深、社会矛盾积累。

政治制度的根源性作用

经济制度之所以形成并长期维持，取决于政治制度的性质。政治制度回答两个问题：

1. 谁掌握权力？
2. 权力如何被约束？

若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且缺乏制衡，他们就会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汲取性经济制度。若权力被广泛分享，并且存在有效的制衡机制（议会、选举、法治），则更可能形成包容性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之所以决定经济命运，是因为它决定了社会内部的“激励结构”。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让政府对公民负责；一个汲取性的体制，则让政府只对统治集团负责。

制度差异如何形成

为什么有的社会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另一些则建立了汲取性制度？原因在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历的政治冲突与权力分配过程。

制度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斗争”出来的。每当社会的经济机会扩大（例如技术创新、贸易增长），新的群体会崛起，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改变旧制度。旧的精英则竭力阻止这种变化。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新的群体能够挑战旧势力，就可能产生制度变革；否则，旧制度会被强化。

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比

举一个典型例子：17 世纪的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都曾面临同样的财政困境——战争开支巨大，政府需要新的税收来源。但两国的政治结果截然不同。

在英格兰，国王必须依赖议会批准税收；而议会代表着地方地主与商人。当查理一世试图绕过议会征税时，随即引发内战。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议会最终取得主导权，确

立了“税收需经代表同意”的原则。政治权力的分散，使得经济活动获得更大自由，也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反观奥斯曼帝国，苏丹对税收与土地拥有绝对控制权。面对财政危机，他的做法是加重赋税、拍卖税收权、压榨农民。结果，经济活动被扼杀，社会停滞不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制衡皇权，也没有制度激励推动创新。

制度的自我强化

一旦建立起来，制度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包容性制度会产生新的经济机会，这些机会又使得中产阶层壮大，从而进一步巩固政治包容性。反之，汲取性制度会压制经济活力，使社会贫穷，从而减少能挑战权力的群体——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历史的发展不是自动的，而是制度路径的延续。包容性社会与汲取性社会之间的差距，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大。

从历史到现代的延续

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许多印证这一逻辑的例子：

- 英国光荣革命后，包容性制度推动了工业革命；
-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制度导致拉美长期贫困；
- 美国独立后形成的宪政结构，保障了创新与企业精神；
-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集权体制，使其在 19 世纪工业化浪潮中落后。

同样的机制，延续到今天：韩国与朝鲜的制度差异，直接决定了南北经济的巨大反差；波茨瓦纳在独立后建立民主制度，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维持汲取结构——两国命运天壤之别。

制度的持续与循环 (Persistenc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制度一旦确立，往往会自我强化。汲取性制度使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这种集中又进一步增强他们维持现状的能力。于是社会陷入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循环——我们称之为“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在这种循环下，贫穷不仅仅是缺乏资源，而是制度性结果。被剥夺的人缺乏政治力量，无法改变游戏规则；而掌权者利用权力继续汲取，阻止包容性制度的形成。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陷入过这样的循环。例如：

- 拉丁美洲的土地寡头结构；
- 非洲殖民遗产形成的精英政治；

- 中东的家族君主制；
- 东欧和中亚的党国体系。

这些制度结构都将国家变成了一种“掠夺机器”（extractive apparatus）。

波茨瓦纳的例外：包容性制度的幸存

非洲在二十世纪中叶普遍独立，但大多数国家在短暂的政治开放后迅速滑向专制、腐败与掠夺。然而，**波茨瓦纳（Botswana）**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1966 年独立时，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约 70 美元，连一条铺装公路都没有。按常理，它的命运应当类似津巴布韦或塞拉利昂——贫穷、腐败、动荡。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波茨瓦纳实现了平均每年近 5% 的持续增长，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富裕、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关键在于它在独立时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波茨瓦纳的独立运动由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领导。他不仅是酋长后裔，也是现代教育的产物。独立宪法规定了多党选举、产权保护和司法独立；同时，传统酋长会议（kgotla）被制度化为基层参与机制，让民众能公开讨论并影响政策。卡马政府将钻石开采收益用于公共教育与基础设施，而非私人财富。

结果是，权力受到社会约束，经济激励开放给全民。波茨瓦纳成为证明：即使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只要政治制度包容，资源也能成为繁荣的动力，而不是诅咒。

索马里：无政府与掠夺的极端

与波茨瓦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Somalia）**。索马里在殖民时期由英国与意大利分治。独立后，国家结构薄弱，部族政治主导，缺乏统一的法治与行政体系。

1969 年，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发动政变，建立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实际上是以军事力量和部族利益为核心的掠夺型体制。政府通过国家垄断贸易与外援资源，向特定部族分配利益。当冷战结束、外援减少后，国家迅速崩溃。

1991 年政权倒台后，索马里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各部族军阀瓜分领地，沿海地区还出现大规模海盗活动。国家不再存在，社会回到了“人人与人为敌”的丛林状态。

这说明：**缺乏中央约束的混乱，与权力过度集中的专制，结果同样是掠夺**。无论权力被一人垄断还是被完全分裂，缺乏包容性制度都会导致贫穷。

朝鲜与韩国：制度分叉的镜像

再看朝鲜半岛。朝鲜与韩国曾是一个国家，拥有相同的民族、语言与文化。1950 年的朝鲜战争结束后，半岛被分裂为两个制度体系。

北方在金日成领导下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拥有全部土地与工业，私人经济被取缔，创新被视为政治风险。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初期，苏联援助与重工业积累让北方一度领先，但随着体制僵化与外援枯竭，经济迅速衰退。到了 1990 年代，饥荒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南方则在李承晚与朴正熙时代，逐步转向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虽然早期威权统治仍然存在，但政府推动教育、保护产权、鼓励企业竞争。随着政治开放与民主化进程，经济持续繁荣。今天，韩国人均 GDP 超过三万美元，而北朝鲜不到两千美元。

同一民族、同一地理、同一文化，却因制度差异而走向天壤之别。

制度的打破与变革 (Breaking the mold)

制度虽然具有持续性，但并非不可改变。历史上存在一些时刻——革命、战争、外部冲击——它们打破了既有的权力格局，创造了变革的机会。

我们称这种时刻为“**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例如：

- 英国的光荣革命 (1688 年)；
- 日本的明治维新 (1868 年)；
- 博茨瓦纳独立后的宪政选择；
- 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
- 南非的种族隔离终结。

在这些时刻，新旧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未来制度的方向。若包容性力量能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社会便进入良性循环；若失败，掠夺循环将延续。

良性循环 (Virtuous circle)

包容性制度同样会自我强化。因为它创造了政治与经济的开放结构，使得权力更难被垄断。开放市场带来财富增长，财富增长孕育了更强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又推动政治问责与公共服务的改进。

这种**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是现代繁荣国家的根本动力。它使创新不断被激励，社会活力得以持续。

结语

贫穷与繁荣并非命运的馈赠，而是制度的结果。制度塑造激励，激励塑造行为，行为决定历史。正如第一章的诺加莱斯与第二章的加纳案例所展示的那样，**谁制定规则、谁从中受益、权力如何被约束——这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第4章

细微差异与关键节点

导言

历史从未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每一个社会在其早期都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而这些结构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被强化。看似微不足道的制度差异，往往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被放大，造成深远的分化。

本章将展示：

- 为什么初始条件相似的社会，最终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 为什么某些社会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包容性制度，而另一些社会却陷入掠夺；
- 为什么历史不是单线的，而是路径依赖的。

从罗马帝国到现代：制度的路径依赖

罗马帝国的遗产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制度格局。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体制在西欧形成：贵族分封土地，农民以劳役换取保护。而在东罗马（拜占庭）及其继承者——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持续存在。这一区别在中世纪以后被不断放大，成为西欧与中东在经济与政治上分化的根源。

西欧的封建结构虽然等级森严，却在地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当贸易、城市与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权力制衡君主。反观奥斯曼帝国，所有土地都名义上属于苏丹；地方长官不过是皇权代理，缺乏自主性。这种中央集权的结构抑制了社会力量的成长，也阻断了制度演化的多样性。

历史的“关键节点”

我们称**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为——历史上那些打破旧平衡、创造新可能的时刻。它们往往由外部冲击触发，如战争、瘟疫、技术革命或全球贸易扩张。在这些

节点上，社会的既有制度会与冲击发生作用，不同的反应方向，导致截然不同的制度演化路径。

黑死病、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冷战结束——都是典型的关键节点。

关键节点并不会自动带来包容性制度。它只是打开一扇可能的门：如果新的社会力量能够在政治上取胜，就可能建立更包容的秩序；反之，旧精英会利用危机进一步强化掠夺。

黑死病：制度分化的原点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是最著名的关键节点之一。它在 1346 年至 1353 年间席卷欧洲，夺走了约三分之一人口。劳动力骤减，使得封建制度的基础动摇。

在英格兰与西欧，农民短缺使地主不得不提高工资、缩减农役。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urers, 1351) 压制工资上涨，但效果有限。农民利用劳动力稀缺的机会争取自由，甚至爆发起义——如 1381 年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结果是，封建劳役被逐步替代为租金契约，市场关系扩大。西欧因此走向更开放、更包容的经济结构。

而在东欧，情况截然相反。贵族势力强大，利用劳动力短缺反而强化了对农民的控制。波兰、匈牙利、普鲁士等地重新确立了“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迁徙与议价的权利。

同一个冲击，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正是制度路径依赖的体现。西欧的包容性增强，东欧的掠夺性加深。

新大陆的发现：另一场制度分化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与殖民时代。这场全球性冲击成为第二个关键节点。但不同国家在面对新大陆时，制度反应再次截然不同。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征服由王权直接控制。征服者在美洲建立了恩科米恩达与米塔制度，延续了旧大陆的等级与掠夺结构。大量财富流入少数精英与王室之手，强化了汲取性体制。

而在英国，殖民活动更多由私人商人与公司发起。由于英国国内权力相对分散，殖民地被迫实行地方自治。从弗吉尼亚众议院(House of Burgesses)到新英格兰的镇会议(Town Meetings)，殖民地居民逐渐形成自治与契约文化。

于是，同样面对新大陆的机遇，西班牙帝国变得更加专制，而英格兰帝国变得更加分权与包容。

英格兰的路径：从冲突到制度创新

英格兰的制度分化并非偶然。它的封建结构在中世纪就形成了某种“分散的权力平衡”。地方贵族与商人阶层能够通过议会制衡君主。16 至 17 世纪的宗教改革与海外贸

易，进一步壮大了新兴资产阶级。

当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试图恢复专制时，冲突爆发。1642 年的内战、克伦威尔时期的共和实验、1660 年的复辟、以及最终 1688 年的光荣革命——这一连串事件确立了宪政秩序：议会至上、法律优先、税收需经代表同意。

光荣革命之后，金融市场与产权保护机制得以确立——国家债券、中央银行、股份公司制度相继出现。这些制度创新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奥斯曼帝国的停滞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却在同一时期陷入停滞。虽然在 16 世纪时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但其政治结构高度集中，所有土地与税收权归苏丹。地方总督（pasha）无自治权，商人阶层受严格限制。创新常被视为威胁，印刷术直到 18 世纪才被官方允许。

结果是：欧洲的权力分散带来了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而奥斯曼帝国的集权则导致了保守与停滞。

殖民地的制度复制（The colonial transplant of institutions）

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制度差异已经形成，并在海外扩张中被复制和放大。殖民不仅仅是地理的征服，更是制度的输出。

那些拥有包容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国家——如英格兰、荷兰——在海外殖民地中更容易形成自治与产权保护；而那些延续中央集权与等级剥削传统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则把本土的掠夺结构完整地移植到新大陆。

殖民地因此成为一种“制度实验室”。虽然地理相似、资源相似，但由于母国制度的不同，殖民地的制度演化出现了分化。这一分化在北美与拉美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北美与拉美：制度的两条路径

在北美，英格兰殖民地由于最初贫穷、缺乏金银、土著人口稀少，殖民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这迫使他们建立更平等的土地分配和自治制度。1619 年弗吉尼亚成立了北美第一个民选议会——**House of Burgesses**，1620 年清教徒在《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中确立自治原则。殖民地居民通过契约与协商解决事务，这种制度文化逐渐内化为政治传统。

而在拉美，情形完全不同。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以掠夺为核心的殖民体制。**恩科米恩达（encomienda）制度**赋予征服者对当地原住民的控制权，**米塔（mita）制度**强迫印第安人轮流从事矿山与基础设施劳动。财富通过殖民官僚与王室渠道流向欧洲。

这种制度不仅压制了经济活力，也塑造了社会等级。殖民精英与本地劳工的鸿沟，后来演化为现代拉美社会的阶层固化。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诺加莱斯：同样的地理、文化与起点，却因制度而天差地别。

制度的锁定 (Institutional lock-in)

制度一旦确立，就会通过激励机制与权力结构自我延续。殖民地独立后，原有的精英结构往往被“本地化”，而不是被推翻。

在拉美，独立运动结束后，新生国家表面上摆脱了西班牙统治，但政治权力仍集中于少数地主与军人手中。他们继承了殖民时代的土地制度与劳工体系。政治形式上出现了宪法与选举，实质上却是寡头政治。

墨西哥独立后的“波菲里奥时期”（Porfiriato, 1876–1911）便是典型例子。总统迪亚斯（Porfirio Díaz）维持了表面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却通过军队与警察镇压农民，保护地主与外国资本利益。这正是“旧制度的新包装”：经济增长服务于少数集团，而多数人被排除在外。

类似地，非洲在二十世纪中叶独立后，也复制了这种模式。殖民政府留下的中央集权结构被独立政权接手。虽然殖民者离开了，但权力依旧被极少数政治家垄断。结果是——殖民者走了，殖民制度还在。

制度与机会的不平等

制度分化不仅影响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差异。在包容性制度下，个人通过教育与市场竞争改变命运；在掠夺性制度下，社会流动受限，贫穷与特权代际传递。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使得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权力被垄断时，穷人缺乏渠道改变制度，而制度又通过资源分配进一步压制穷人——形成一个闭环。

制度不平等因此成为“历史命运”的主要来源。

打破锁定：何以可能？

既然制度会自我强化，那么，社会是否还有机会改变？答案是：有，但极其困难。历史表明，制度的转折往往需要三种力量之一：

1. **广泛的社会动员**——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
2. **外部冲击**——如战争、殖民解体、技术革命；
3. **内部改革联盟**——如博茨瓦纳独立后的政治妥协。

这些变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包容力量是否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失败，则意味着掠夺循环的延续。

结语

细微差异会在关键节点被放大。地理与文化只是背景，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制度在冲击中的反应。**包容性制度产生自开放与制衡，掠夺性制度源于集中与排斥。**

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新大陆的征服，从英格兰的革命到拉美的寡头政治，历史的逻辑都在反复证明这一点：制度的选择，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这也为我们理解后续章节埋下伏笔——为什么有些社会能摆脱掠夺循环，而另一些永远被困其中。

第5章

我见过的未来——它行不通

苏联的奇迹与幻象

1928年，约瑟夫·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随后的二十年里，这个原本落后的农业国家完成了惊人的工业化。钢铁、煤炭、电力和军工产量节节攀升。1930年代的苏联似乎印证了一个诱人的命题：**在集权制度下，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与增长。**

当时，世界上许多人把苏联视为“未来的样子”。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访问苏联后写下那句著名的话：

“我见过未来，它是有效的。”（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陷于萧条与失业，而计划经济却充满效率与秩序。许多知识分子也曾抱有类似的信念——认为通过国家力量，可以取代市场，实现更快的工业化。

确实，在短期内，苏联的增长令人震撼。1930年代，工业产值以每年近6%的速度增长。到1950年，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它的科学、军事、教育体系在外人看来井然有序。然而，这种“奇迹”背后隐藏着根本的制度问题。

计划经济的代价

苏联的增长并非源于包容性的制度创新，而是通过**强制性动员与汲取性结构**实现的。国家对资源的掌控几乎是绝对的：

- 所有企业由政府拥有与指令调配；
- 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kolkhoz）；
- 劳动力迁徙、价格与工资均受国家控制。

在这样的体制下，投资与生产由命令决定，而非市场信号。国家将巨额资源集中于重工业与军备，而牺牲消费品与农业。工人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创新缺乏激励，信息扭曲导致浪费普遍。

计划经济初期确实能迅速动员资源，但这种增长是**掠夺式的**：它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压榨消费与强迫劳动的基础上。乌克兰的大饥荒（Holodomor）和古拉格劳改系统，正是这种体制的极端表现。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用暴力压榨出的钢铁与煤炭，构筑了短暂的表面繁荣。但由于缺乏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缺乏持续性。

增长的极限

195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济活力开始减退。虽然国家仍能在军事与航天领域取得成就，但整体效率下降。创新逐渐停滞，技术差距与西方拉大。1959 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厨房辩论”中争论哪种制度更优时，赫鲁晓夫仍自信地宣称：“我们会在二十年内超越你们。”然而，仅仅三十年后，苏联就解体了。

经济学家们指出，这种早期高增长的根本原因，是**资源重新配置**而非技术进步。当一个落后国家将农业人口强制转入工业部门时，生产率确实会暂时上升。但这种增长不能无限持续。一旦可动员的资源被耗尽，而体制又抑制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增长就会停滞。

苏联的增长模式就像燃烧干柴：火焰猛烈，却难以长久。

掠夺制度下的“高增长悖论”

苏联的经验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掠夺性制度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无法实现持续繁荣。**

原因在于，集权体制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通过强制手段完成工业化或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权力集中、产权不稳、缺乏创新激励，这种增长最终会因制度内在的约束而崩溃。

掠夺性体制的统治者往往只关心政治安全。他们害怕开放市场和思想，因为那会削弱控制。于是，创新被压制，精英腐化，经济逐渐僵化。

苏联在 1970 年代后期陷入“停滞期”（Era of Stagnation）。经济增长率降至 2% 以下，科技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改革派如科西金（Aleksei Kosygin）提出市场化尝试，却被保守派阻止。1980 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来得太晚。当制度的基础已经腐蚀，再多的改革也无法挽救体系。

苏联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掠夺性制度无法自我修复**的必然结果。正如包容性制度能产生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掠夺性制度同样陷入自我削弱的恶性循环。它们能制造力量，却无法维系生命。

苏联的终结

到 1980 年代，苏联经济的停滞已经无法掩盖。生产率持续下降，技术创新匮乏，消费品短缺成为常态。中央计划系统因信息失真而崩塌——成千上万个工厂按照指令生

产，却无法响应真实需求。国家的激励体系也陷入悖论：厂长的升迁取决于完成产量指标，于是出现了大量“数字造假”与低质高产的现象。价格体系失去意义，整个经济机器靠行政命令勉强维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出**改革与公开政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试图以市场机制和政治开放挽救体制。但开放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当信息流通与批评空间出现，人们开始质疑体制的合法性；当地方企业获得部分自主权，中央对资源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改革动摇了统治结构，却未能重建激励机制。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

这场崩溃不是技术失败，而是制度失败。掠夺性制度可以暂时动员，但无法自我修正。当它面对社会多样性、经济复杂性与技术变革时，只能瓦解。

纳粹德国与“秩序的幻觉”

另一种掠夺性增长出现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政权通过国家计划、军备扩张与基础设施投资迅速恢复经济。失业率从1933年的30%降至1938年的2%。高速公路网络、军工体系、科研机构——看似高效有序。

然而，这一增长同样建立在暴力与掠夺之上。政府压制工会、废除罢工权、限制价格与工资，并通过国家征用与对外侵略获取资源。“秩序”的代价是自由的消失。

纳粹政权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但这种复苏完全依赖于战争准备与奴役体系。当战争结束，掠夺基础消失，整个经济即刻崩塌。它的繁荣，只是掠夺的延迟账单。

集权式增长的现代回声

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例子并非历史孤例。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国家在某一时期也出现过“高增长的集权奇迹”。

在东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国家动员数亿劳动力进行“赶英超美”的大跃进。钢铁产量确实在几年内翻倍，但质量低劣、资源浪费巨大，农业因“人民公社化”而崩溃，最终导致大饥荒。这是掠夺性体制典型的**增长幻象：生产的数量被视为目标，而人的福祉被忽视。**

在朝鲜，金日成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指令经济。早期在重工业投入与外援帮助下增长较快，但随着外部援助枯竭与体制僵化，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信息封锁与个人崇拜，使任何改革尝试都不可能发生。

在非洲，许多后殖民国家也重复了这一模式。政府以“国家发展”为名建立国有垄断，结果腐败滋生、效率低下、资源被少数精英掌控。掠夺的结构换了面孔，却没有改变本质。

为什么掠夺性增长无法持续

掠夺性制度之所以最终走向崩溃，是因为它无法提供持续的创新激励，也无法形成可信的产权与契约。它的统治者惧怕社会开放，因为开放意味着权力的不确定。于是，

他们压制技术、扼杀企业、限制教育——这些行为也同时摧毁了长期增长的根基。

当经济越复杂，中央控制越难维持；当社会越富裕，对权利与透明的要求越高；掠夺性制度的内在矛盾就越深。它要么收紧控制、扼杀活力；要么放松控制、引发失序。无论哪种结果，长期繁荣都不可能实现。

增长的真实基础

苏联和其他集权经济体的兴衰揭示了一个根本结论：**持续繁荣不能依靠恐惧、命令或动员，而必须建立在包容性制度之上**。只有当个人拥有安全的产权、自由的选择和表达空间，社会的创造力才能被释放。

包容性制度并不完美，也常伴随冲突与低效，但它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掠夺性制度可以制造速度，包容性制度才能维持生命。

正如历史所示，那些“我见过的未来”往往只是一种幻象。真正的未来，属于那些能保障自由与创新的制度。

第6章

渐行渐远

新的鸿沟

十八世纪中叶，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分化阶段。在此之前，虽然各地文明之间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并不极端：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欧洲的生活水平均远低于现代标准。

然而，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差距骤然拉开。英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产出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均 GDP 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倍。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逐渐加入这一阵营——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繁荣俱乐部”。

与此同时，非洲、拉美、南亚、中东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化和技术革命没有在这些地区生根。全球不平等由此真正形成。

这一历史进程，被称为“**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技术浪潮中起飞，而另一些国家被抛在后面？

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包容性制度长期积累的结果。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多层次的政治制衡、自由的思想环境与开放的市场共同孕育了创新的制度土壤。1688 年光荣革命后，议会控制了税收与支出，私人产权获得保障，政府借贷合法化，国家信用体系形成。这使企业家可以安全投资，发明家可以从创新中获益。

同时，英国的社会结构相对流动：贵族不再垄断财富来源，商人阶层能通过经济活动进入上层社会。教育与印刷传播带来思想启蒙，科学方法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催化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这种爆发不是一时的幸运，而是**包容性制度的自然产物**。它使创造力、冒险精神与市场激励形成正反馈循环。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跟上

技术本身可以传播，但制度无法轻易复制。许多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也接触到新技术，却没有产生相同的增长。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政治权力仍被君主与教会垄断。任何挑战既得利益的创新都可能被压制。手工业者和企业家缺乏保护，市场垄断严重。

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直到十八世纪才被官方允许；商人阶层缺乏独立权力，经济受皇权控制。结果是，当工业革命席卷欧洲时，奥斯曼的制度仍停留在前现代阶段。

在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央集权抑制了地方自治与商业资本。虽然中国早期的技术水平不低，但缺乏保障产权与鼓励创新的机制。国家对思想和出版的严格控制，使科学与工业知识难以积累与传播。

在拉美，殖民体制留下的等级结构与土地垄断，使经济缺乏竞争与流动性。独立后，新国家延续旧制度，政治精英将国家变成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工业化的浪潮到来时，他们缺乏制度上的准备。

创新与激励的核心

工业革命的关键不只是机器、煤炭或蒸汽，而是**激励机制的转变**。当人们相信发明会受到保护、利润不会被夺走、失败不会带来政治风险时，他们才会投入时间与资源去创新。

包容性制度通过三个渠道强化创新激励：

1. 产权保护：发明成果可被占有与交易；
2. 市场开放：新企业能挑战旧垄断；
3. 政治参与：政府难以任意掠夺或扼杀新兴产业。

相反，掠夺性制度扼杀了这一切。当权力垄断、法律不公、创新带来威胁而非机会时，经济体自然停滞。

早期的分化信号

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制度优势开始显现。1760年后，纺织、冶金、蒸汽机技术连锁突破。企业家如瓦特（James Watt）、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达比（Abraham Darby）等相继崭露头角。他们能够将发明商业化，是因为产权与资本市场为其提供了安全的制度支撑。

与此同时，法国虽拥有丰富的科学人才与发明，但由于君主专制与行会垄断，创新难以转化为生产力。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改革后仍保持农奴制度，社会缺乏自由与激励。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内部的分化已极为明显：西欧工业化迅速推进，东欧仍停留在农业封建结构。

这种分化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永久改变。从此以后，技术与资本的积累在包容性社会中形成滚雪球效应，而掠夺性社会则陷入落后与依附。

工业化的扩散与限制

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从英国扩散到西欧。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很快效仿英国建立了现代工厂体系。随后，德国与北欧国家也相继工业化。

这种扩散并非自然蔓延，而取决于制度环境。凡是能保障产权、限制君主权力、促进教育与交通投资的国家，都能吸收新技术。反之，那些维持封建等级和掠夺结构的社会，即使引进机器，也难以建立真正的工业体系。

普鲁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通过土地改革与义务教育，逐步削弱贵族庄园制，形成现代化国家；而俄国直到 1861 年才废除农奴制，政治仍受沙皇控制。结果是，德国崛起为工业强国，而俄国长期落后。

在欧洲之外，制度差异更为明显。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建立包容性改革：废藩置县、普及教育、设立国会、保护企业。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开放”，使日本成为唯一成功赶上西方的非西方国家。而中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印度等地区因权力集中、改革受阻而错失机会。

殖民扩张与新的掠夺结构

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帝国扩张。欧洲列强利用技术、军力和资本优势，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殖民体系。这场扩张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也在世界范围内复制了**掠夺性制度**。

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殖民统治者常以“现代化”为名，将土地、矿产与劳动力纳入帝国的经济体系。铁路、港口和税收制度看似带来“发展”，实则服务于资源输出与贸易控制。

殖民制度的特征是：

- 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殖民官僚与本地代理人手中；
- 土地被重划为大农场或特许垄断区；
- 税收制度用来榨取而非建设；
- 教育与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

非洲的例子尤为典型。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在划分殖民地时无视部族与经济结构。比属刚果的橡胶征收制度、法属西非的强制劳役、葡属安哥拉的资源输出——这些掠夺性安排为欧洲工业提供原料，却摧毁了当地的制度发展。

殖民体制不仅掠夺财富，也塑造了长期的政治文化：集权、腐败、排他。当殖民地独立后，这种制度往往被新精英继承，延续旧的权力格局。

世界经济的两极化

到十九世纪末，全球经济格局已彻底两极化。工业化国家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贸易、金融与技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成为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市场。

这种两极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也体现在**制度结构**上：包容性制度国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掠夺性制度国家陷入恶性循环。

在包容性社会中，创新与教育持续扩散；中产阶级扩大，政治更加开放；社会冲突虽频繁，但能在制度框架内被化解。

在掠夺性社会中，财富集中，政治排他；国家机器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贫富差距固化；制度改革屡屡被精英阻挠。

这种差异通过国际贸易与殖民关系被放大：工业国输出制成品与资本，掠夺国输出原料与劳力。全球化本应促进交流，却在制度不平等的前提下加剧了分化。

技术扩散的局限

人们常以为技术可以跨越国界带来普遍进步，但事实是——**技术的传播取决于制度激励**。在缺乏包容性制度的国家，技术往往被滥用或束缚。

例如，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虽然工厂、铁路、电报等西方技术被引进，但由于产权不稳、政府干预严重、劳工受压制，这些新技术并未带来生产力革命。

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建造铁路、港口和电信系统，表面上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但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资源运输效率。铁路连接的是矿区与港口，而不是城市与市场。技术服务于掠夺，而非发展。

制度差异的放大效应

十九世纪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循环：包容性制度通过技术、教育和资本积累不断强化自身，掠夺性制度则被锁定在依附与贫困之中。

包容性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军事实力，使其能进一步扩张影响力与制度输出；掠夺性国家的贫困削弱了自主改革能力，使其不得不在国际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

由此，制度差异不仅解释了国内的贫富不均，也解释了**全球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世界开始“渐行渐远”，而这条分化的轨迹，一旦形成，就极难逆转。

尾声

工业革命本身并不决定谁富谁穷，决定性的，是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当包容性制度鼓励创新与参与时，技术成为提升全体生活水平的力量；当掠夺性制度压制自由与创造时，技术则被转化为压迫与控制的工具。

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正是两种制度逻辑的较量史。包容者崛起，掠夺者沉沦。这场分化，塑造了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

第7章

转折点

制度的分水岭

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在关键时刻摆脱掠夺性的循环，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停滞？答案往往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制度的转折，几乎总是源于社会力量的重新分布。

前几章我们看到：掠夺性制度可以短暂制造增长，但无法长期维持；包容性制度则能激发创新与持续繁荣。本章要探讨的，是从掠夺到包容的**转折点 (turning point)** 是如何出现的。

这种转折既不是自然演化，也不是开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来自社会冲突、权力制衡与政治妥协的产物。历史上最典型的转折之一，就是 1688 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

英格兰的制度危机

十七世纪初，英格兰仍是一个半专制国家。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坚信君权神授，屡次绕过议会征税。王室与新兴商人、地主、城市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上，商业资本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政治上，君主仍试图维持封建特权。

1620—1640 年间，冲突不断升级。议会拒绝为国王拨款，国王则解散议会、实施专制。这种对抗最终爆发为英国内战。议会军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击败王党，查理一世被处死。但共和国短暂存在后又陷入军人独裁。1660 年王政复辟，查理二世重登王位，专制阴影重现。

整个世纪的动荡，实质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传统贵族、教会与君主的联盟在衰落，而商人、城市与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新的经济力量要求新的政治制度。

光荣革命：制度的重构

1688 年，议会邀请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入主英格兰，推翻詹姆斯二世。这场革命几乎没有流血，却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制度结构。

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 确立了几个关键原则：

- 君主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或维持常备军；
- 议会拥有立法与财政主权；
- 言论与选举自由受宪法保障。

更重要的是，革命确立了政府的**责任制与可问责性**。国王若违宪，可被合法废黜。国家信用制度随之建立：议会授权发行公债，政府借款有了合法依据，金融市场迅速发展。

这套制度形成了包容性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它保护私人产权，鼓励企业投资，使个人敢于创新、敢于挑战旧秩序。

新制度的经济效应

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经济结构迅速变化。金融机构与股份公司崛起，伦敦成为欧洲的资本中心。政府债券市场的信用稳定，吸引了投资者和海外资本。

随着市场扩张，制造业和航运业繁荣，技术创新开始系统化。从纽科门蒸汽机到瓦特的改良，从纺织业机械化到煤矿冶炼革命，这些创新得以扩散，是因为**制度提供了安全的激励环境**。

相反，法国在同一时期仍由专制君主统治。路易十四的集中权力和高税政策削弱了资产阶级；1700年后，法国财政危机频发，政府信用崩溃。没有制度保障，企业家不敢承担长期风险。结果是，两国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差距逐步扩大。

政治冲突与制度进步

光荣革命并非结束，而是起点。英格兰此后一个世纪的政治仍充满斗争——地主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工业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殖民扩张带来的分配争议。

但关键在于：这些冲突被纳入制度框架内解决。议会代表制与司法独立使改革得以持续。从选举权扩张到工会合法化，社会的包容性逐步增强。

制度的演化因此呈现**正向累积**：开放带来创新，创新带来增长，增长又扩展了社会参与的基础。这种反馈机制，使英格兰（后来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类似的冲突却常被镇压。没有制度容纳改革，社会只能在暴力与停滞间循环。

为什么其他国家错过了转折点

英格兰在十七世纪末迎来制度转折，但几乎所有同时代国家都未能走上同样的道路。这些国家同样面临经济变革与政治冲突，却因权力结构与社会组织的不同，错失了建立包容性制度的机会。

法国：从专制到革命再到专制

在法国，经济现代化的力量与君主专制长期对立。路易十四时期，国家集权达到顶点。王室财政依赖对农民和商人的重税；贵族与教会享有免税特权；议会与市民阶层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这种制度扼杀了包容性发展的可能。虽然法国在科学与文化上成就卓著，但经济潜能被权力垄断所抑制。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爆发，确实推翻了旧制度，却没能立即建立新的平衡。革命后的政治权力迅速落入少数军事与官僚手中。拿破仑的崛起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政治自由再度被压制。

法国的经验说明，**革命本身不足以创造包容性制度**。若权力仍集中于新精英手中，掠夺的逻辑就会以新的形式延续。

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权力的惰性

在西班牙，封建与宗教势力阻断了制度创新。贵族控制土地，教会掌握教育与思想；商人阶层受重税与垄断束缚。尽管西班牙曾依靠殖民财富维持强盛，但这种财富流向了王室与教会，而非产业与技术。

每当改革派试图削弱特权，保守势力便以“捍卫信仰”之名予以压制。结果是，社会结构僵化，政治停滞。

奥斯曼帝国的情形类似。苏丹垄断土地与税收权，地方长官与军队官僚构成利益联盟。任何自治或商业力量的兴起，都被视为对皇权的威胁。当西欧迈入工业时代时，奥斯曼仍停留在征税与贡赋的体系。**权力的惰性**使其无法产生突破。

为什么转折如此罕见

制度的转折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再分配。掌权者几乎从不会主动放权力。只有当社会中出现足够强大的反制力量，并且能在冲突中达成妥协，包容性制度才可能出现。

英格兰的特殊之处在于：

1. 经济结构多元——商人、地主、工匠、城市议会形成复杂的权力网络；
2. 政治文化中已有“议会传统”可资利用；
3. 社会冲突虽激烈，但最终形成妥协而非彻底崩溃。

而在多数社会，要么反抗力量被镇压，要么革命导致新的独裁。社会的二元分化——强国家与弱社会——阻止了权力平衡的形成。

因此，历史上的“转折点”极为稀少。它需要冲突、组织与妥协的罕见组合。

包容性制度的自我强化

一旦包容性制度确立，它会通过激励机制自我强化。开放的市场创造新的经济力量，这些力量反过来支持制度的延续。教育与创新的扩散，提升了社会参与的能力；政治竞争使政府不得不回应公众需求。

这种循环并非一帆风顺，但具有**韧性**。包容性社会能够吸收冲突，而非被冲突摧毁。它们通过渐进改革取代暴力革命，通过妥协维持长期稳定。

相反，掠夺性制度的循环是反向的：权力越集中，改革阻力越大；创新被压制，经济衰退；衰退又迫使统治者更依赖暴力与控制。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崩溃。

制度命运的分歧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包容性制度逐步巩固，而欧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掠夺性结构。这一分歧成为近代世界的制度根源。

包容性制度赋予社会活力与自我修复能力，掠夺性制度则在短暂繁荣后陷入停滞。这种差异在工业革命中被进一步放大，最终决定了国家间“渐行渐远”的命运。

转折点，并非每个社会都能遇到，更非每次冲突都能带来进步。历史给予机会，但只有少数社会抓住了它——因为他们拥有能将冲突转化为制度的力量。

第8章

别想在我的地盘上发展

增长的敌人

人们常以为统治者希望国家繁荣。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掠夺性制度下，精英们往往主动**阻止发展**。他们害怕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变革会削弱自身权力。

这种“增长的敌人”现象，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无论是非洲的殖民政权、拉美的寡头政府，还是亚洲的封建帝国，精英们都以“稳定”“秩序”为名，封锁创新与竞争。

他们的逻辑十分清晰：若新技术、新产业或新阶层崛起，旧的特权结构将面临威胁。因此，与其冒险促进发展，不如维持现状。掠夺性统治者宁愿国家停滞，也不愿失去控制。

非洲的殖民封锁

非洲的殖民制度是“阻止发展”的典型样本。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瓜分殖民地，并建立以掠夺资源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殖民政府从未打算建设本地经济。铁路与公路的修建主要用于资源出口；教育体系只培养基层文员和翻译；工业化被严格限制，以防本地企业与宗主国产业竞争。

英属黄金海岸（今加纳）曾禁止当地可可农民自建加工厂，法属西非的企业若试图出口制成品，也会被征以高税。殖民地被塑造成单一出口经济：黄金、可可、花生、橡胶、铜——一切只为宗主国的工厂服务。

这种制度化封锁，不仅剥夺了经济潜能，也扭曲了社会结构。殖民者扶持少数地方酋长与官僚作为代理，让他们通过征税和劳役维持秩序。一旦独立，这些本地精英往往继承了殖民体制，延续掠夺逻辑，而非推翻它。

拉丁美洲：旧秩序的新外壳

十九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脱离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统治。独立运动带来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但并未带来包容性制度。

新共和国的宪法充满自由和平等的口号，现实中却由军人、地主与教会把持权力。殖民时代的土地垄断与劳工压迫继续存在。农民与原住民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例如，墨西哥独立后的“波菲里奥时期”（Porfiriato, 1876–1911），政府表面推进现代化，实际上将铁路、矿山和土地集中于少数财团手中。经济增长的果实只属于精英集团。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极点，爆发了 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

拉美的悲剧在于：革命摧毁了旧统治，却没能建立包容新秩序。旧精英被推翻，新精英取而代之，国家继续在掠夺与不平等的循环中打转。

制度惰性与精英恐惧

掠夺性制度具有强大的惰性。精英害怕改革，因为任何开放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他们担心自由贸易削弱垄断，担心教育普及催生批评，担心城市化与媒体削弱控制力。

因此，他们采取一系列“防御性策略”：

- 限制教育与思想传播；
- 控制金融与土地市场；
- 压制工会与独立组织；
- 维持政治排他与法律特权。

在短期内，这些策略似乎有效。社会保持稳定，权力集中，财富持续流向顶层。但从长期看，这种防御性掠夺使国家丧失创新能力。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如技术革命或国际竞争，这些社会往往陷入崩溃。

掠夺的理性

这些行为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政治理性。精英们清楚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当经济多元化、社会流动增强、知识传播加快时，他们的政治控制必然削弱。

因此，他们有动机去**阻止进步**。经济学家称之为“政治替代效应”：统治者为了保持权力，会牺牲经济效率。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明知改革有利的情况下仍拒绝改革。

正如十九世纪末埃及的总督伊斯梅尔所说：“我希望现代化，但不能让人民觉醒。”这种矛盾心态，是所有掠夺性制度的通病。它们渴望财富，却惧怕自由。

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幻影

二十世纪初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梅尼利克二世击退意大利入侵，保住独立地位。在非洲殖民浪潮中，这看似一个成功故事。然而，国家的独立并未带来包容性改革。

皇室与地方贵族依旧掌握土地与劳役，农民承担沉重税负，被迫为贵族提供劳动力。梅尼利克和继任者海尔·塞拉西虽然引进铁路、电报和学校，但这些“现代化”成果都服务于王权，而非社会。

教育名额被严格控制，只有贵族子弟能进入学校或官职。当知识与政治被垄断时，改革无从发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生与士兵掀起革命，推翻君主制。然而，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政府”继续延续掠夺结构。土地国有化、政治迫害与强制集体化，使国家再度陷入贫困与内战。

埃塞俄比亚的命运说明：即使在独立与革命之后，若权力依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掠夺的逻辑仍会换个名字延续下去。

南非：种族制度的经济防线

南非的制度更清楚地展示了掠夺的政治理性。在十九世纪，金矿与钻石的发现使南非成为非洲最富的殖民地之一。白人殖民者与布尔人政权为维持经济利益，设计了一整套排他制度，确保黑人劳动力被永久束缚在低工资与强迫劳动体系中。

1913年《土地法案》规定，黑人只能在7%的土地上居住和耕种；城市居住与迁徙受到严格限制。采矿业建立“通行证制度”，黑人必须持许可证进入工作区，工资被人为压低，教育被限制在最基础水平。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显然不是发展经济整体，而是保证矿业利润与白人统治。黑人劳动力被故意保持“无技能、可替代”的状态，以防形成新的经济阶层或政治组织。

这套制度在1948年正式制度化为“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直到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南非社会仍在承受制度遗产的长期后果。

亚洲的另一面

在亚洲，也能找到类似的掠夺性封锁。缅甸、老挝、柬埔寨在独立后继承殖民体制，国家控制贸易、土地与资本，军事政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压制私营经济。

缅甸的奈温将军在1962年掌权后，实行所谓“缅甸式社会主义”，国有化几乎所有产业，关闭对外贸易。经济迅速崩溃，但军政府却借此消灭了社会中产与政治对手。

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时期的“指导民主”表面反殖民，实际上巩固了总统个人权力。军方与财团结成利益同盟，任何地方自治与工会活动都被视为威胁。只有在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国家才开始艰难地转向开放与法治。

这些例子共同表明：掠夺性统治者并非无法理解增长逻辑，而是出于**政治自保**主动压制增长。

阻止发展的制度逻辑

掠夺性制度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它能提供短期稳定与精英安全感。统治者担心经济多元化会催生政治竞争，担心教育普及会唤醒民众诉求，担心新产业会削弱旧垄断。

这种恐惧驱动出一种“防御性发展策略”：

1. 只在可控领域进行有限现代化；
2. 优先投资军队与安全机构；
3. 利用国家资本扶持依附性企业；
4. 将民众政治化或民族化，以分化潜在反对力量。

结果是，国家表面现代化，实质停滞。经济增长的基础被制度本身掏空。当外部冲击来临——如国际危机、价格波动或社会运动——掠夺性政权往往因缺乏合法性与韧性而崩溃。

结语：为什么他们不让你发展

掠夺性制度拒绝发展的原因，从来不是无知或愚昧，而是权力结构的理性选择。对统治者而言，发展意味着风险；停滞反而更安全。

正如历史一次次证明的那样，没有权力制衡的社会，无论多么富有、资源多么丰富，最终都会被自己的恐惧所束缚。

他们不让你发展——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太懂。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世界贫困根源的关键。

第9章

发展的逆转

当繁荣走向衰落

历史上，不乏从贫困走向繁荣的社会；但更常见的，是那些曾经繁荣的国家最终陷入衰退。罗马、威尼斯、西班牙、奥斯曼帝国——它们都曾在某个时代掌握技术、财富与制度优势，却在后来失去了活力。

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社会在获得包容性制度后，又重新滑入掠夺？**这种“发展的逆转”，揭示了权力如何回收自由、摧毁创新。

罗马的衰落

罗马共和国时期曾建立相对开放的政治制度。贵族与平民共享一定的政治参与权，法律体系相对透明，市场活跃。这种制度为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领土扩张与财富涌入，军队与贵族阶层逐渐掌握了国家机器。大量奴隶劳动力的引入，使普通公民丧失经济地位；富豪阶层垄断土地与贸易，政治腐败、民粹冲突和军权膨胀接踵而至。

尤利乌斯·凯撒的崛起标志着共和国终结。他以改革之名集权，最终建立起皇帝制。自此，罗马进入“专制稳定”的长夜。创新被官僚体制和军队压制，社会活力被吸干，帝国在内部腐化中走向瓦解。

罗马的故事说明：包容性制度并非一旦建立就能永存。当权力再次集中，繁荣就会变成衰败的前奏。

威尼斯的倒退

中世纪的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共和国之一。它的繁荣来自开放的贸易与政治包容。商人可以通过行会参与政府，海外贸易带来巨额财富，社会阶层具有上升通道。

然而，正是这种成功孕育了特权集团。随着财富集中，少数家族逐渐掌控政治议会，并在1297年通过“封闭法案”（Serrata）。该法案规定：只有在册贵族家庭的男性才能

担任议员，新的社会成员被永久排除在政治之外。

威尼斯从开放的商人共和国，变成了世袭的寡头政体。贸易垄断与财富继承扼杀了创业精神。当葡萄牙与西班牙开辟新航路后，威尼斯已无力竞争。制度的封闭，让它在地理与技术革命面前失去了应变能力。

包容性变掠夺性，往往并非外部征服，而是内部固化。

西班牙：财富的诅咒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统一并征服新大陆。巨额金银从美洲源源不断流入欧洲，使西班牙成为当时最富的国家。

然而，这场财富洪流并未带来现代化。王室和贵族垄断殖民收益，普通民众无缘参与经济增长。国家依赖外来白银维持开支，而不是发展工业与制度。

短期的富裕反而削弱了改革动力。贵族轻视商业，国家机器日益臃肿。当白银产量下降时，西班牙财政崩溃，产业凋敝。掠夺性制度用金银装点了帝国的表象，却掏空了它的根基。

西班牙的经历，是典型的“资源诅咒”——财富替代了制度，权力拒绝创新，最终导致全面衰落。

奥斯曼帝国：停滞的荣耀

奥斯曼帝国在十六世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行政体系高效、军队纪律严明。早期苏丹利用功臣与奴隶体系制衡地方贵族，维持了政治的相对平衡。

但这种平衡建立在对创新的控制之上。奥斯曼禁止印刷术，将工商业限制在行会之中，并以宗教法官体系约束思想传播。所有土地名义上归苏丹所有，私有产权被视为潜在威胁。

随着欧洲进入科学与工业时代，奥斯曼仍维持旧结构。军队与官僚拒绝改革，技术引进被视为削弱权威的风险。结果是，帝国在十八至十九世纪逐渐衰退，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

奥斯曼的停滞，是掠夺性制度**自我保护**的结果。为了维持统治，它牺牲了创新与自由，从而失去了未来。

近代的制度退化

制度的逆转并非古代世界的专利。即使在近代，许多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退化。它们在某个阶段实现了政治开放与经济增长，随后却被新的权力集团重新垄断。

十九世纪的阿根廷是一个典型例子。独立初期，阿根廷建立了宪法与代议制度，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拉美最繁荣的港口城市。然而，地方军阀和地主寡头很快控制了选举与土地。权力集中于少数家族之手，国家机器成为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

经济增长短暂而脆弱。当国际市场波动或政治危机出现，国家缺乏制度约束来吸收冲击。阿根廷在二十世纪反复经历军事政变与通货膨胀，每一次政治重建都以新的掠夺循环告终。

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非洲和亚洲。独立初期的加纳、尼日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都拥有宪法与选举制度，但精英很快通过政变或紧急状态重新夺取权力。包容性的萌芽被扼杀在制度形成之前。

殖民地独立后的退化

殖民地独立带来了民族主权，却未能改变制度基础。殖民政府留下的中央集权结构与官僚体系，被新政权继承并强化。

独立后的统治者以“国家建设”为名，取消反对党，控制媒体，将权力集中到总统府与军队。外援与资源出口成为统治的经济支撑，腐败与裙带关系取代了公共治理。

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曾雄心勃勃地提出工业化计划，但在政治上打压反对派，修改宪法，最终走向个人独裁。1966年，他在政变中被推翻，国家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

掠夺性制度不仅延续了殖民遗产，还以“发展主义”的名义强化了权力垄断。

资源繁荣与制度退化

现代世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逆转形式：**资源型繁荣的政治陷阱**。当国家因石油、矿产或其他资源而突然富裕时，统治者往往利用资源收入强化控制，而非推动改革。

中东、非洲和拉美的许多产油国就是例证。政府用石油财富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补贴制度，通过分配资源来收买支持，同时压制言论与政治竞争。当油价下跌时，经济体系暴露出高度依赖与脆弱性。

资源繁荣取代了制度建设，国家因此丧失了创新与多元化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石油诅咒”：财富越多，改革越难。

现代专制的再生产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虽然引入了宪法、选举和议会，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通过控制媒体、司法与选举制度，制造“民主的外壳”，掩盖掠夺的实质。

这些“选举威权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在形式上模仿包容性制度，实质上却继续维持权力垄断。政治竞争被驯化，经济资源被垄断，结果是增长脆弱、腐败泛滥、创新受限。

苏联的东欧卫星国、拉美的军政府政权、以及部分后冷战时代的石油国家，都体现了这种现代掠夺机制。掠夺者不再高举王权，而是披上“民主”的外衣。

制度退化的机制

为什么包容性制度会倒退？原因在于它的成功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兴精英希望冻结变革，以保护既得利益。他们通过操控法律、限制竞争、影响媒体与选举，逐步收回开放空间。

除非社会能够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否则制度的开放性会被内部腐蚀。正如威尼斯的贵族、罗马的元老、以及现代的寡头集团，他们都在经济成功后选择关闭系统。

包容性制度要持续存在，必须依赖持续的政治竞争与社会监督。一旦失去制衡，掠夺就会重新抬头，发展便走向逆转。

结语：逆转的教训

制度的退化提醒我们：繁荣并非线性上升的过程，也不是文明“自然进步”的结果。没有任何国家能永远保持包容。权力若失去限制，任何开放社会都可能退化为掠夺政权。

罗马、威尼斯、西班牙、奥斯曼帝国、以及近代的阿根廷与非洲国家，都在不同的时代重演了同一个结局——**当政治权力重新集中，发展的方向也会反转。**

历史的真正启示是：防止退化，比取得繁荣更困难。因为掠夺的诱惑，永远存在于制度内部。

第 10 章

繁荣的扩散

包容性的外溢效应

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技术、思想与制度开始跨越国界传播。这种扩散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布。

然而，繁荣并非自动蔓延。包容性制度的扩散需要社会内部的斗争与外部的启示。它既可能通过模仿传播，也可能在革命或危机中爆发。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这种扩散的核心舞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通过政治改革或社会冲突，逐步吸收了包容性制度的要素。

法国大革命：制度的震荡传播

法国大革命是包容性理念全球扩散的起点。1789 年的革命不仅推翻了王权，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原则：自由、平等、法治、人民主权。

这些理念通过战争与外交扩散到整个欧洲。拿破仑帝国虽然是军事征服者，但在被征服地区废除了封建特权，推广《民法典》，建立现代官僚体系。在德意志、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许多旧制度被打破，为后来的改革留下空间。

然而，法国的革命也展示了包容性制度扩散的矛盾：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当社会结构缺乏制衡机制时，革命容易滑向极端，最终被独裁所取代。拿破仑的帝国统一了制度，却扼杀了政治参与。

因此，法国的经验是一种**制度传播的震荡模式**：它点燃了改革的火种，却未能立刻带来稳定的包容性秩序。

德国：从上而下的改革

与法国的革命不同，德国的现代化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惨败后，意识到旧的封建结构难以抵御现代国家。1807—1815 年间，施泰因与哈登贝格领导了改革运动：废除农奴制、改革教育、建立公务员制度。

这些改革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建立统一市场与铁路网络，并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

虽然政治上仍保持君主体制，但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使德国迅速崛起。它成为“包容性要素”在专制体系中部分生根的例子。制度并未完全开放，却已具备激励创新与投资的条件。

这说明，包容性制度的扩散并不一定是革命的结果。在某些情形下，当统治者认识到改革有助于国家竞争力时，他们也可能主动引入包容性元素。

日本：明治维新的跨文化吸收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非西方社会中最成功的包容性制度转型。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以“黑船事件”迫使日本开放。幕府体制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危机中崩溃。

1868 年明治天皇即位后，新政府迅速推行全面改革：废藩置县，废除封建领主；实行义务教育与征兵制；建立议会与宪法，吸收西方法律制度；鼓励民营企业与工业化。

这些措施重塑了国家的制度基础。最关键的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了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旧武士阶层被纳入国家建设，而非被彻底消灭。

明治维新表明：包容性制度的扩散需要**外部冲击与内部协调**的结合。没有外部压力，旧秩序不会自我改革；没有内部组织，改革也无法执行。

包容性理念的跨国影响

十九世纪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有思想层面，更体现为制度的模仿与竞争。

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国的法典体系、德国的教育与工业政策、美国的宪政与企业管理模式，都在不同地区被引入与本地化。

这种扩散有三个渠道：

1. 战争与征服：被征服者往往被迫接受新的制度框架；
2. 模仿与学习：改革派主动吸收成功国家的经验；
3. 经济竞争：为了追赶领先国家，落后者不得不开放与创新。

但无论哪种方式，包容性制度的成功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接受与适应。制度无法简单移植。若缺乏政治参与与法治文化，外来的制度常被掠夺性结构吸收、扭曲，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制度的扩散不是复制，而是重生。

模仿的陷阱

包容性制度的扩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进入高潮。欧洲大陆、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试图模仿西欧与北美的成功。他们引进宪法、设立议会、成立银行与工厂，但结果却

大不相同。

原因在于：**制度的外形可以模仿，激励机制却难以复制**。若旧精英仍掌握资源与政治权力，新制度往往被他们重新塑造成掠夺性工具。

拉丁美洲便是典型案例。十九世纪后期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纷纷制定了“现代宪法”，设立“民选政府”。然而，选举被操控，土地依旧集中，经济发展依赖出口原料与外资。结果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实质上的旧秩序。

同样，奥斯曼帝国在 1839 年后推行“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希望学习欧洲的行政与法律制度。但改革受限于宫廷与宗教势力的抵制，官僚腐败与特权未被削弱。制度被“外壳化”：有宪法无法治，有议会无权力。

这些失败说明，制度移植若缺乏社会基础与政治竞争，结果只是换个名义的掠夺。

成功的扩散与区域对比

与之相对，北欧国家展现了包容性制度成功吸收的路径。十九世纪的瑞典、丹麦、挪威，原本是贫穷的农业社会，贵族势力强大。但在工业化和农民运动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逐步建立议会制、普选权与社会福利体系。

北欧的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

1. 广泛的教育与社会动员，为政治参与提供基础；
2. 农业改革削弱贵族特权，使经济结构更平等。

结果是，到二十世纪初，北欧国家普遍形成了高度信任的社会，政府透明，腐败极低，创新活跃。他们成为包容性制度“和平扩散”的典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欧与拉美。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地主寡头与弱势公民社会，缺乏独立司法与自由媒体。当工业化到来时，国家缺乏制度吸纳能力，改革被利益集团所截留。

二十世纪的全球传播

进入二十世纪，包容性制度的理念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进入全球。民族独立运动、高等教育的普及、通信革命、国际组织的建立，都加速了制度观念的扩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与宪政成为国际主流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联合国、人权宣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包容性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新框架。

但这场扩散仍伴随冲突。冷战时期，苏联与西方的对峙代表了两种制度模式的竞争。社会主义阵营试图以计划经济实现公平，却因缺乏政治参与与创新激励而陷入停滞。最终，苏联解体，再次印证了包容性制度的韧性与适应力。

全球化与新问题

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为包容性制度的扩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渠道。资本、技术与信息流动，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接触世界市场。然而，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包容。

若政治权力集中，全球化只会强化既有的不平等：精英通过垄断外资与出口渠道获利，劳动者和中小企业被排挤。结果是“外向型增长、内向型掠夺”。

例如，部分资源出口国在全球化中获得巨额收益，却未能建立透明的财政体系或普惠教育体系。繁荣的成果被私人化，贫富差距扩大。包容性制度的核心——参与与制衡——并未真正实现。

制度竞争与未来的扩散

尽管失败与挫折不断，包容性制度仍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原因在于：**制度竞争**。开放社会在长期中展现出更高的创新力与生活水平，而掠夺性政权在面对危机时脆弱易碎。

这种对比构成了现代世界的“软力量”扩散。教育、媒体、跨国企业与互联网，不断传播开放、法治与问责的理念。

包容性制度的扩散，不再依赖征服或殖民，而是通过榜样效应与信息流动实现。这是一种缓慢却持续的演化。

结语：扩散的极限与希望

包容性制度的扩散改变了世界，但仍未完成全球覆盖。在许多地区，掠夺性结构依然根深蒂固。他们能够利用现代技术维持控制，利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抵制开放。

然而，历史的趋势仍然清晰：当知识与交流跨越边界，当人们看到自由与繁荣的成果，包容的理念便会继续扩散。

制度的力量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一切，但它像水流一样，终将冲破堤坝。

繁荣的扩散，是人类历史最艰难却最持久的革命。

第 11 章

良性循环

包容性的自我强化机制

包容性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并非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能在冲突中自我修复。

政治与经济的开放，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与监督机制。当统治者试图滥用权力时，公众能够通过法律、媒体或选举加以约束；当新技术或产业出现时，社会能灵活调整结构，吸收变化。

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构成了包容性制度的核心优势。它不会让冲突消失，却能让冲突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这便是所谓的**良性循环 (virtuous circle)**：开放带来增长，增长带来参与，参与反过来巩固开放。

英国：从改革到稳定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良性循环的典范。光荣革命后建立的议会制度，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新的挑战：人口激增、城市化、工人阶级的崛起。

起初，政治权力仍集中在地主与商人手中。1832 年《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随后在 1867 年与 1884 年进一步普选化。每次改革都伴随社会运动与抗议，但政府选择妥协而非镇压。

这种**制度性妥协**使得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的革命动荡。政治参与的扩大带动公共教育、工会合法化、卫生与住房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社会矛盾被纳入制度渠道解决，国家稳定性反而增强。

经济上，包容性制度为企业家与工人提供激励。发明与投资受到保护，劳资冲突通过谈判机制化解。十九世纪末，英国虽面临德国与美国的竞争，但其政治与社会结构的韧性依旧强大。

美国：民主的扩展

美国的制度良性循环始于宪法的设计。三权分立与地方自治，保证了政治权力难以长期垄断。十九世纪中叶的“杰克逊民主”运动，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与政治参与。

然而，美国的包容性制度也并非天生平等。奴隶制、种族隔离与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真正的制度扩展，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斗争实现的。

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但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二十世纪的民权运动、女性参政运动、劳工运动，不断推动制度边界扩大。

这种持续的**社会压力与制度回应**形成了美国式的良性循环：每一次运动都暴露制度缺陷，每一次改革又增强制度合法性。

经济增长与政治开放在美国相互促进。企业创新依赖法律保护与市场自由；而财富增长带来的社会流动，又激发了公众对民主与公平的更高要求。

法国：从革命到共和

法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多次制度波动。从拿破仑帝国到复辟王朝、再到第三共和国，政治体制反复更迭。然而，长期的动荡并未摧毁包容性趋势。

1870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第三共和国确立普选制与议会制，并通过教育改革和地方自治巩固民主。虽然政局仍有起伏，但制度逐步形成自我修复能力。

法国的经验说明：即使起点充满冲突与专制遗产，只要社会力量能在制度框架内持续竞争，包容性制度终将稳固。良性循环并不要求完美的开端，而是取决于社会能否持续推进改革。

包容社会的共同特征

纵观这些国家，良性循环的形成有几个共同要素：

1. 政治竞争：多党制与定期选举限制权力；
2. 法治与独立司法：保障契约与个人自由；
3. 教育普及：提升社会参与能力；
4. 公民社会：形成持续的舆论与组织力量。

这些机制使包容性制度具有“自稳态”。当危机出现时，社会能通过合法途径调整；当精英滥权时，制度能通过选举或法律纠偏。

良性循环并非无冲突，而是在冲突中找到平衡。这正是掠夺性社会最缺乏的能力。掠夺者害怕变化，包容者吸收变化。

防止倒退的机制

包容性制度虽然稳定，但并非不可逆。任何社会都可能面临权力集中的风险。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建立**防止倒退的制度机制**。

这些机制的核心是“制衡”：没有任何群体能够长期垄断政治或经济权力。它通过多种形式存在：

- 独立的司法体系，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产权；
- 自由媒体与言论空间，揭露腐败与滥权；
- 地方自治，分散中央集权的压力；
- 公民社会组织，持续监督权力运作。

在这种制度结构下，即便出现腐败或政策失误，社会也能通过合法渠道修正。正因如此，包容性国家能在危机中生存，而掠夺性国家往往在危机中崩溃。

美国的制度防线

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掠夺倾向的政治浪潮。十九世纪的“强盗贵族时代”中，大型垄断企业与金融集团积累了巨大权力。政治腐败猖獗，选举被金钱操纵。

然而，美国的制度防线最终起作用了。媒体揭露丑闻，公众舆论高涨，政府在 1890 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限制垄断、恢复竞争。二十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改革，推动行政透明、选举改革与劳动保护。

这些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民间压力与制度回应的互动中形成的。正是这种互动，阻止了美国走向寡头统治。

同样，二十世纪的大萧条与金融危机，都考验了制度的韧性。罗斯福新政扩展了政府职能，同时保持民主机制的运行。危机没有摧毁制度，反而催生了新的社会契约。

英国的防御性改革

英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改革同样体现了防御机制。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与劳工问题，一度威胁社会稳定。

然而，英国政府不断通过立法回应：1833 年《工厂法》限制童工劳动；1870 年教育法确立义务教育；1911 年国民保险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改革都是在政治妥协中完成的。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执政，在竞争中吸纳公众诉求。制度通过调整自身避免了革命。这正是良性循环的要义——**改革替代崩溃，妥协取代暴力**。

危机与韧性

包容性制度最大的优势，不是避免危机，而是在**危机中幸存并重生**。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运动，都曾撼动民主国家的根基。

但在这些冲击中，包容性社会展现出非凡的自我修复能力。德国与日本在二战后重建，通过民主与市场机制迅速恢复。美国在 1970 年代的通胀与政治丑闻后，依然维持了制度稳定。

原因在于，包容性制度允许社会通过合法渠道发泄不满，并将冲突转化为改革。掠夺性制度则试图压制冲突，结果在压力积累中爆发崩溃。

为什么良性循环罕见

纵观世界历史，良性循环的社会始终是少数。大多数国家仍被掠夺性制度困住，原因在于建立制衡与包容的代价极高。

它需要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强大的公民社会与教育体系。这些条件往往只有在长期积累中形成。而精英集团几乎从不会主动让渡权力。

因此，良性循环的出现既稀有又脆弱。一旦建立，必须不断维护。政治冷漠、社会分化或外部威胁，都可能削弱其根基。

结语：自由的韧性

良性循环的力量，不在于避免冲突，而在于吸收冲突。它将权力竞争制度化，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改革动力。

这种制度并不完美，但它是人类找到的最稳健的繁荣之路。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真正持久的繁荣，不是来自强人或奇迹，而是来自制度中的**自由、制衡与参与**。

良性循环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成熟形态——当社会学会用制度管理权力，用自由守护未来。

第 12 章

恶性循环

掠夺的自我复制

掠夺性制度并不只是偶然的权力滥用，而是一种能够自我延续的体系。它通过暴力、法律与经济利益，不断再生产自身的基础。

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他们会利用制度强化控制，通过任命、垄断与宣传，阻止任何挑战其统治的力量出现。

贫困不是掠夺的副产品，而是它维持自身的手段。当民众缺乏教育与资源时，就难以组织反抗。于是，掠夺者通过制造依赖与恐惧，巩固统治。这便是**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权力带来掠夺，掠夺制造贫困，贫困反过来稳定权力。

刚果：掠夺的延续

非洲中部的刚果，是恶性循环的典型例子。十九世纪末，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文明使命”为名，将刚果变成私人殖民地。橡胶、象牙、矿产被疯狂掠夺，村庄被迫提供劳工，违抗者遭到残酷惩罚。

这种暴力体制在 1908 年被国际舆论迫使结束，但掠夺结构并未消失。独立后的刚果（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继承了殖民政府的中央集权与资源依赖模式。首任总理卢蒙巴试图建立民族民主，却在冷战干预中被推翻与暗杀。

随后，蒙博托上台，建立持续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他以“国家统一”为名控制军队与矿业，将国家财政转化为私人财富。道路、学校与医院荒废，民众陷入贫困。

这场悲剧说明：**掠夺性制度不会因政权更替而自动消失**。新的统治者往往继承旧的权力结构，将其继续用于个人利益。殖民掠夺变成本地掠夺，恶性循环由外部压迫转为内部延续。

拉丁美洲的循环

拉丁美洲在独立后同样陷入制度恶化。殖民时期形成的土地集中与种族等级，在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新国家的宪法写满自由条款，但政治实质仍是寡头统治。

例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咖啡寡头，控制土地、出口与政权。工人组织被镇压，教育与卫生投资极低。国家机器只为保护精英利益服务。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冷战中支持这些寡头政权，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结果，社会改革被阻止，革命与镇压反复上演。掠夺性制度在国际政治的庇护下持续存在。

在这种体系中，经济增长虽偶尔出现，但成果从未普惠。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受阻。恶性循环以“稳定”的名义维系不公。

苏联：权力的极致集中

苏联的经验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掠夺循环。1917 年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却并未建立包容性制度。列宁与斯大林创建了高度集权的党国体系，所有资源与决策都集中在政治局手中。

这种体制初期带来了快速工业化与军事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被官僚体系扼杀，经济停滞，社会失去活力。

统治者为了维持控制，通过秘密警察、审查与计划配额体系，强迫顺从，惩罚异议。权力越集中，改革越困难。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经济僵化，科技落后，政治合法性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试图打破循环，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中失败。1991 年苏联解体，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实验”以掠夺性制度的崩塌告终。

这场历史说明：掠夺性制度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持久；其崩溃往往突然而剧烈，因为长期压抑的矛盾没有制度出口。

掠夺的政治逻辑

为什么恶性循环如此稳固？原因在于掠夺性制度具有内在逻辑：

1. 权力集中产生利益集团；
2. 利益集团依靠掠夺维持地位；
3. 任何改革都威胁他们的生存；
4. 因此他们必须压制改革，维持现状。

这种逻辑使得掠夺性社会难以自我改革。当外部压力或危机来临时，统治者更倾向于加强控制而非开放。结果是——恶性循环越陷越深。

掠夺的理性与恐惧结合，构成了人类社会最顽固的制度陷阱。

非洲的当代掠夺

独立后的非洲，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却在制度上延续了掠夺结构。

从加纳到尼日利亚，从津巴布韦到安哥拉，独立后的领导人往往出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但一旦掌权，便复制了殖民者的体制。国家被视为分配资源的机器，权力成为财富的唯一通道。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以民族解放英雄的姿态上台，早期推行教育与土地改革，但很快转向权力集中与恐惧统治。反对党被压制，媒体被封禁，土地被重新分配给政权盟友，农业产出骤降，经济崩溃。

尼日利亚凭借石油出口成为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却长期陷入腐败与暴力。石油收入被少数政治集团与军方瓜分，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长期被忽视。当油价波动时，国家财政立即陷入危机。

非洲的掠夺制度往往以“国家建设”为名，实质是权力掠夺的合法化。军政府与一党制的循环，使社会难以形成稳定的制衡机制。

中东的财富与恐惧

中东地区的掠夺结构有其独特形式。石油财富让部分国家看似富裕，却进一步加剧了权力集中。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以“君主福利国家”模式维持统治：政府通过石油收入向民众发放补贴与公共职位，以经济依附取代政治参与。这种“分配型稳定”使社会表面平静，但缺乏创新与多元化能力。

在资源较少的国家，如埃及与叙利亚，军队成为国家的核心权力机构。他们掌控经济企业、媒体与政治任命，形成“军人资本主义”。任何改革尝试都被视为威胁，统治者宁可牺牲增长也要维持控制。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短暂打破了沉默，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与机会。但革命并未带来包容性制度。旧精英重掌权力，新政权陷入混乱或战争。

掠夺的惯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

恶性循环的社会心理

掠夺性制度不仅塑造经济结构，也塑造人心。在长期压迫下，民众学会了服从与自我审查，对政治冷漠，缺乏信任。

这种心理被统治者利用与强化：宣传强调“秩序”“传统”“外部威胁”，以恐惧维持忠诚。社会逐渐失去公共精神，个人只关注生存与小范围利益。

掠夺制度由此形成心理上的自我封闭。即使统治者更替，这种社会心态仍然延续，成为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

从恶性循环到崩溃

掠夺性政权看似稳固，实则脆弱。当外部压力增加、内部资源枯竭时，它们往往迅速崩塌。

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刚果与利比亚的内战、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源于制度无法应对危机的现实。

因为在掠夺体系中，一切权力与资源都集中于顶端，当顶端失去控制，整个国家便失去运作能力。没有自治、没有信任、没有制度缓冲。

崩溃不是改革的前奏，而是掠夺逻辑的必然终点。在权力垄断的社会里，每一次“更新”只是掠夺者的更替，而非制度的重生。

结语：陷阱的力量

恶性循环的力量在于它的自我强化。权力依赖掠夺，掠夺制造贫困，贫困反过来削弱反抗与改革。

要打破这种循环，必须建立新的激励与制衡机制。这不仅需要政治革命，更需要社会信任、教育与法治的积累。

历史告诉我们：掠夺可以制造短暂的辉煌，却无法创造持久的繁荣。它是权力的幻觉，文明的毒药。

只有当社会学会限制权力，恶性循环才会终止，而真正的自由与发展才会开始。

第13章

当今国家为何失败

掠夺在现代世界的延续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规模前所未有，科技进步与全球化让知识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然而，国家之间的繁荣差距依旧巨大。在相同的技术环境下，有些国家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仍陷于贫困与冲突。

问题不在于资源、文化或地理，而在于制度。**掠夺性制度并未随着现代化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今天的掠夺者不一定披着军装或王冠，他们可能是民选总统、党国精英、或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操纵选举、控制媒体、垄断经济、利用民族主义或安全恐惧维系权力。

现代掠夺的本质与古代并无不同——剥夺多数人的机会，让少数人掌握财富与政治权力。

非洲的掠夺新装

非洲一些国家在独立半个世纪后，仍未摆脱贫困。国际援助、外资与全球贸易的增长，并未改变其制度根基。

在安哥拉，石油收入巨大，却被政府与军方高层私吞。国家预算缺乏透明，社会基础设施荒废，民众的生活水平与资源财富形成鲜明对比。

在尼日利亚，民主制度形式存在，但选举被金钱与暴力操控。政治家通过“赞助网络”分配职位与合同，用资源购买忠诚。掠夺性体制被披上了选举的外衣。

在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的崩溃并未带来重生。继任政府延续旧的利益结构，通过货币超发、通胀与短期补贴维持统治。国家陷入持续的经济停滞。

国际援助在这些体系中往往起到反作用。外部资金被统治集团用于强化控制，而非推动包容性改革。**援助若不改变权力结构，只会延长掠夺的寿命。**

拉美：民粹与依附

拉丁美洲的历史充满了改革与倒退的循环。二十世纪中叶，多个国家尝试工业化与社会改革，但掠夺性制度以民粹主义的形式卷土重来。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是典型案例。他以“反贫困”“反寡头”为旗号上台，通过石油收入推行大规模补贴与国有化。初期确实改善了底层生活，但同时削弱了私营经济与制度独立性。

当油价下跌时，财政崩溃、通胀暴涨，国家陷入深度危机。掠夺不再是少数精英对多数的剥削，而是以“人民名义”的再分配政治。**民粹主义是掠夺性的另一种形式——它用短期福利换取长期依附。**

阿根廷与玻利维亚也经历过类似命运。每一次改革都被政治不稳定与财政滥用抵消，制度无法积累信任。在这种结构下，增长周期短暂，危机反复上演。

中亚与东欧的寡头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后，东欧与中亚国家迎来了制度转型的契机。然而，结果分化严重。

波兰、捷克、爱沙尼亚等国通过法律与选举改革建立包容性制度，成功融入欧洲体系；而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则陷入“寡头资本主义”。

在这些国家中，权力与财富被少数企业集团与政治联盟控制。他们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能源垄断、以及安全机构的协助，形成“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俄罗斯的寡头体系尤为典型。九十年代的私有化让极少数人获得巨额财富，他们反过来支持政权，换取保护与垄断地位。媒体被收编，司法被政治化，民主制度沦为表演。

掠夺的形式更隐蔽，但机制相同：权力制造财富，财富反哺权力，制度失去独立性。

亚洲的专制增长

亚洲的若干国家展示了另一种掠夺逻辑——在高度集权下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显著成就，但其制度性质存在差异。新加坡的法治健全、官僚高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包容性要素。而中国与越南的增长则建立在党国体系之上。

在这些体制中，市场被引入，但政治权力未放松。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活力，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高管、地方官员、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体制内分享增长红利，而社会流动性逐渐下降。

这种结构的危险在于：当增长放缓、矛盾积累，掠夺性倾向可能重新主导政策。**专制增长若不转向包容，最终将遭遇制度的极限。**

全球化的悖论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被许多人视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贸易开放、资本流动、技术扩散——理论上应当使各国共享增长成果。

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在掠夺性制度下，全球化往往成为强化不平等的工具。

外资与跨国企业进入后，首先与本地政治精英结盟，以特许权、关税保护或土地优惠换取利益。收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民众却承担环境破坏与劳动剥削的代价。

掠夺性国家无法有效利用开放带来的资源。因为它们缺乏法治与透明的治理结构，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与创新压力，反而促使统治者进一步收紧控制。

例如，资源出口国在高油价时期迅速致富，却没有投资教育与产业多元化。当国际市场波动时，国家陷入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

全球化不是万能药，它只是放大了制度的差异。包容性国家因开放而繁荣，掠夺性国家因开放而分化。

援助的局限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投入了巨额援助资金，试图推动贫困国家的发展。然而，效果远不如预期。

原因在于，外部资金无法改变内部权力格局。在掠夺性国家中，援助往往被统治集团截留，成为政治忠诚与裙带网络的润滑剂。

援助机构倾向于与政府合作，却忽视了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资金被用于修建象征性工程、维持补贴与官僚体系，而非真正的制度改革。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援助强化了掠夺性制度的稳定。当外部资源源源不断时，统治者无需依赖税收，也就无需回应民众的诉求。

没有问责的援助，只能制造新的依附与腐败。

技术革命的双刃剑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本应削弱专制，因为它让知识与沟通更自由。然而，在掠夺性政权中，技术也可以成为控制工具。

现代监控体系、社交媒体审查、数据分析与舆论操控，让统治者比过去更精准地维持权力。科技不再天然属于自由，而取决于谁掌握它、如何使用它。

同时，自动化与全球供应链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在制度不透明的国家，技术红利被少数企业与官员垄断，劳动者被边缘化。

技术进步若不伴随制度进步，只会让掠夺更高效。这正是当代“数字威权主义”的核心逻辑：现代化表象下的制度退化。

改革的困境

许多国家尝试制度改革，但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原因不在于政策设计，而在于权力结构的顽固。

掠夺性制度能吸收改革语言，却不改变自身本质。“反腐运动”“行政简化”“经济振兴计划”，常被用来清除政治对手或重组权力网络。当改革触及精英利益时，便被扭曲或夭折。

真正的制度转型，必须建立在社会力量的持续压力上。只有当公民组织、独立媒体与教育体系成熟，改革才能超越权力表演，变成结构性改变。

结语：现代掠夺的面具

当今世界的掠夺性制度，不再以暴力和奴役为标志，而以选举、增长和民族主义为包装。

它可能拥有议会、法院与媒体，却都服从于权力核心；它可能在统计上实现增长，却无法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

现代掠夺的危险在于伪装。它让社会误以为自己在前进，实则在地打转。

国家失败并非宿命，但打破恶性循环需要勇气、组织与长期积累。外部援助、技术与市场可以提供工具，唯有包容性制度能提供方向。

当今国家为何失败？因为权力仍被少数人掌握，而大多数人仍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现代世界的繁荣与贫困之分，仍然取决于那同一个根源：谁在制定规则，又为了谁制定规则。

第 14 章

打破旧格局

制度转型的悖论

掠夺性制度并非不可动摇，但要打破它，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旧秩序不仅掌握权力，还掌握社会运行的全部资源与意识形态。

历史上，真正的转型往往发生在**制度危机**时刻：当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外部压力加剧、旧体制无法维持经济或社会秩序，新的政治力量才有机会崛起。

然而，危机本身并不保证变革。许多社会在危机中选择更严厉的专制，只有少数社会利用危机实现开放。这正是“打破旧格局”的关键差别。

英国：革命的再平衡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制度突变的经典例子。此前的英国国王声称“君权神授”，垄断税收、立法与军权。当经济扩张、商人阶层崛起时，这种结构开始动摇。

1620—1640 年间，国会与王权冲突不断，最终爆发内战。查理一世被处决，王政一度废除。虽然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并未带来自由，但它削弱了君主的神圣性。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真正的转折点。议会推翻詹姆斯二世，邀请威廉与玛丽共同执政。新国王必须接受《权利法案》，承认议会立法与财政控制权。

这一事件打破了权力的垄断，为包容性政治奠定了基础。金融制度、契约保护与贸易自由得以确立，工业革命的土壤由此形成。

光荣革命的意义不在于暴力推翻，而在于建立了**持久的制衡结构**。旧格局被打破，新制度得以自我延续。

美国：从殖民到共和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同样体现了制度突变的力量。殖民者并非出于贫困或饥荒而起义，而是出于对政治平等与经济自主的要求。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印花税法》《茶叶法》征税，限制殖民地的贸易与立法权。富裕的商人、律师与农民阶层意识到，只要权力仍集中在伦敦，他们的自由与财富随时可能被剥夺。

1776 年《独立宣言》提出了革命性的理念：“人人生而平等”，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对掠夺性制度的全面否定。

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其**制度创新**：制宪会议建立联邦制、三权分立与权利法案。政治竞争被制度化，地方自治与个人自由成为治理的基础。

这种制度结构有效防止了权力再度集中，使美国得以维持包容性发展的轨迹。革命后的社会矛盾并未消失，但有了持续纠偏的机制。

南非：从压迫到包容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二十世纪最顽固的掠夺体系之一。白人少数掌控政治、土地与经济，黑人多数被排除在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制裁与内部抗议同时升级。经济停滞、社会暴力、政治孤立，让种族隔离政权陷入困境。

然而，转折的关键来自**双方的妥协**。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坚持非暴力斗争，并在谈判中保持政治团结。白人政权的部分精英意识到，维持旧秩序只会导致全面崩溃。

1990 年，曼德拉获释；1994 年，南非举行首次多种族选举。制度转型虽然充满风险，但最终避免了内战。

南非的经验表明：即使在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包容的政治愿景与谈判能力**也能打开通往新制度的道路。真正的革命，不是毁灭旧世界，而是重建权力关系。

危机与机会

这些历史转折共有的特征是：危机暴露了旧制度的缺陷，同时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

但机会并非自动转化为变革。在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案例中，危机也可能被极端势力利用，产生新的专制。

打破旧格局需要三个条件：

1. 多元社会力量的形成——没有单一势力能垄断权力；
2. 明确的包容性愿景——改革目标指向自由与参与，而非报复；
3. 可持续的制度安排——确保权力分散并可监督。

只有当这三者同时存在，社会才能真正脱离掠夺的陷阱。否则，革命只是新的循环的起点。

危机本身不会创造自由，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延续自由。

路径依赖的枷锁

掠夺性制度之所以难以打破，在于它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制度不是孤立的法律文件，而是一整套利益与权力的网络。

当一个社会长期在掠夺性结构下运作时，资源配置、教育体系、思想观念都会被塑造。即使政权更迭，新的统治者也会发现自己被旧体制所束缚。

例如，十九世纪末的阿根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菲律宾、以及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都曾试图引入民主与市场机制，但旧的寡头集团迅速适应新制度，通过资本、媒体或军队继续掌权。

这说明，**形式的改革无法改变实质的权力结构**。若缺乏深层社会力量的支撑，旧制度会在新名称下继续存在。

渐进改革的可能性

尽管彻底的革命稀少且代价巨大，制度演化并非只能通过暴力实现。某些社会通过长期的渐进改革，也成功突破了旧格局。

韩国与台湾的转型便是典型例子。两地在冷战时期都由威权政府统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导向与国家资本。然而，随着教育普及与中产阶级壮大，社会对政治参与的需求逐步上升。

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与工会运动，迫使政府开放选举、释放政治犯、并建立独立媒体与宪政框架。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促成了和平的制度转型。

渐进改革的关键在于：

1. 社会力量的累积——教育、媒体与公民组织的成长；
2. 精英妥协——统治者认识到开放比镇压更安全；
3. 外部激励——国际环境支持改革而非专制。

这种路径虽然缓慢，但更有可能形成持久的包容性结构。它不是一场革命的爆发，而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向。

拉美的改革与停滞

拉丁美洲的经验再次说明，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社会结构。智利在皮诺切特之后重建民主，依托于强大的教育体系与中产阶层。而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的民粹化改革，在短期内扩张国家控制，长期却削弱了制度独立性。

没有真正的制衡，改革很容易退化为权力再分配。包容性不是政策结果，而是政治竞争持续存在的状态。

东欧的制度重建

东欧的转型展示了另一种打破旧格局的路径。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同时面对经济崩溃与政治真空。有的国家，如波兰与捷克，建立了独立司法与市场制度，并以加入欧盟为外部约束，逐步形成稳定的民主体系。

而另一些国家，如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虽然举行选举，却未能削弱旧安全机构的权力。结果是制度表面开放，实质封闭。

这种对比表明：外部激励只有在内部制度具备吸收能力时才有效。**外部支持可以催化转型，但无法替代内部的政治斗争。**

历史的共同规律

纵观不同国家与时代，成功打破旧格局的社会往往具备以下特征：

- 形成了多元社会结构，避免单一集团独大；
- 在危机中出现能够协调改革的政治联盟；
- 拥有包容性的理念基础，如法治、公民权与教育普及；
- 建立了长期制衡机制，使改革不可逆。

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或改革都可能被掠夺性势力夺回。制度突变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力量、思想观念与政治机会的交汇。

结语：打破与重建

打破旧格局并非毁灭过去，而是重新定义权力的边界。真正的制度变革，不是让某个群体胜利，而是让权力失去永久胜利的可能。

历史的希望在于，每一次制度突变都让人类更接近包容。从英国到美国，从南非到东欧，无论起点如何，只要社会坚持参与与监督，旧格局终将瓦解。

掠夺的循环或许顽固，但自由的渴望更为持久。正如曼德拉所言：“我们为自由而生，它也终将战胜恐惧与统治。”

第 15 章

理解繁荣与贫困

繁荣的根源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这是经济学最古老、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本书中，我们反复看到同一个答案：**制度决定命运**。包容性制度释放人的潜能，掠夺性制度压制创新与自由。

地理、文化与无知固然影响历史，但都不足以解释国家间的巨大差异。真正决定长期繁荣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权力，以及这种分配如何塑造经济激励。

包容性制度的特征包括：安全的产权、开放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与政治参与。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创造力的生态系统”。

掠夺性制度则以权力集中为核心，限制竞争、压制创新、让资源流向少数精英。结果是短期的繁荣与长期的停滞。

地理与文化的误区

传统理论常把贫困归咎于地理：热带气候、土地贫瘠、疾病流行。但地理无法解释相邻国家的差距——如朝鲜与韩国，墨西哥与美国。同样的气候与自然条件，却产生截然不同的制度与命运。

文化论也存在类似问题。若文化决定经济成功，为何同一文化的社会在不同制度下表现迥异？东亚儒家文化既孕育了日本与韩国的繁荣，也未能阻止中国在明清时期的停滞。

文化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包容性制度鼓励教育、理性与合作，掠夺性制度滋生服从、恐惧与依附。制度塑造文化，而非相反。

“无知理论”的局限

另一种常见观点认为，国家贫穷是因为统治者“无知”或政策错误。若他们知道正确的经济学原则，就能实现增长。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问题不是无知，而是利益。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包容性制度更高效，而是不愿意失去控制权。

当政治权力集中时，改革意味着放弃特权。即使他们理解政策正确性，也没有动力去实施。

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学家的建议常常无效。**掠夺不是误会，而是选择。**只有当权力结构被改变，政策才能真正改变。

历史的路径依赖

制度不是瞬间形成的。它们是长期冲突、妥协与偶然事件的结果。历史创造了惯性，也创造了可能性。

英国的包容性制度来自光荣革命，美国的民主源于独立战争，日本的现代化得益于外部冲击与内部协调。每一次成功转型都建立在独特的历史时刻之上。

这意味着，没有统一的“发展公式”。每个社会必须在自身矛盾中寻找突破口。**历史无法复制，但规律可以理解。**

制度的两条路径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

- 包容性路径：权力分散、社会参与、经济创新；
- 掠夺性路径：权力集中、资源垄断、贫困延续。

包容性社会并非没有冲突，但它能将冲突制度化、转化为改革动力。掠夺性社会或许在短期内稳定，但它的稳定是停滞的假象。

当危机到来，包容性制度能够适应，掠夺性制度则往往崩溃。这就是长期繁荣与贫困的根本分界线。

国家失败，不是因为资源匮乏，而是因为制度拒绝学习与调整。

制度的演化与社会能动性

制度塑造命运，但制度本身并非天定。它们由人类创造，也能被人类改变。历史证明，即便长期陷于掠夺性体系，社会仍可能通过斗争与改革重建包容性结构。

关键在于**社会能动性**——民众组织、舆论监督、思想传播与教育积累。当社会中形成多元力量时，权力垄断就会受到挑战。

教育让人理解权利，媒体让不公被看见，组织让分散的诉求凝聚成行动。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掠夺体系的基础。

制度变革不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是一场**政治与社会的再分配**。它需要时间，也需要持续的压力。

包容性的持续性

包容性制度的最大考验在于能否自我维持。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可能滑向掠夺。当经济不平等扩大、政治极化加剧时，少数群体会试图重新控制制度。

因此，包容性社会必须不断自我更新。这包括：

- 保持政治竞争与透明度；
- 确保法治独立与权力问责；
- 投资教育与社会流动；
- 防止财富垄断与媒体集中。

良性循环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一种持续的运动。当社会停止参与，包容性也会逐渐退化。

自由不是一次获得的，它必须被不断重申。

掠夺性的现代变种

掠夺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形态。现代世界的掠夺可能伪装成发展、披着民族主义或技术进步的外衣。它通过操纵市场、信息与身份政治，延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

当社会被碎片化、信息被操控，公民失去集体行动的能力，制度就会悄然退化。

因此，防止现代掠夺的关键，是维护透明、开放与公共理性。教育与独立媒体，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政治自由的防线。

未来的希望

尽管历史充满失败与反复，人类社会仍不断重建包容。英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日本的维新、南非的和解——都证明了制度可以改变命运。

当代世界的年轻人、女性与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新的力量。他们要求透明、公平与尊严，推动政府在数字化时代重新定义权力关系。

历史的趋势是开放的。掠夺或许能延缓进步，但无法永久压制人类对自由与公正的追求。

结语：制度的启示

国家为何失败？因为制度让权力远离民众；国家为何成功？因为制度让民众参与权力。

繁荣不是天赐，而是制度化的自由。它来自数百年的斗争、妥协与学习，来自人类对尊严与机会的坚持。

未来的世界仍将充满冲突，但只要人类能保持制度的开放，保持权力的可问责性，包容性社会就会继续扩展。

理解繁荣与贫困，就是理解制度与人性的互动。唯有包容，方能长治久安。

第 A 章

附录：制度、历史与发展的再思考

地理与资源的再讨论

有人认为，地理与自然资源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确实，气候、河流与土地影响了早期农业与贸易的形成；但在现代世界，这种影响已不再决定性。

自然资源既可能带来繁荣，也可能带来诅咒。挪威凭借透明治理将石油转化为公共财富，而尼日利亚与安哥拉则陷入腐败与依赖。

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制度：在包容性体制下，它成为教育与公共投资的来源；在掠夺性体制下，它则助长贪婪与冲突。

殖民遗产的长影

殖民统治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制度版图。欧洲列强在非洲、亚洲与拉美推行掠夺模式，建立以税收、劳役与贸易垄断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这种制度在殖民结束后并未消失，许多新兴国家继承了中央集权与资源控制结构。独立的旗帜之下，旧的掠夺逻辑继续存在。

殖民的关键影响不是掠夺的数量，而是**掠夺的制度化**。它把权力与财富的集中变成了“常态”。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殖民国家在独立后仍难以建立包容性体制。

外部援助与发展模式

外部援助在理念上旨在促进发展，但若忽视政治结构，往往适得其反。援助项目需要合作对象，而在掠夺性政权中，政府恰恰是问题的核心。

外部资金被用来维持 patronage（庇护网络），成为统治者购买忠诚与压制异议的资源。这使得援助成为“掠夺的国际化”。

有效的援助必须同时关注制度改革：透明的预算、独立的媒体、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否则，无论投资多少，结果都只是强化旧的权力结构。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

文化与制度并非孤立存在。文化塑造社会的信任结构与合作模式，制度则塑造文化的激励方向。

在包容性制度中，教育与法律鼓励个人责任与创新精神；在掠夺性制度中，恐惧与依附成为主导价值。

因此，真正的文化变革不是口号，而是制度改革的延伸。当制度改变，人们的信仰与行为也会随之更新。

历史的开放性

本书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历史并没有预设的轨迹。制度变革虽艰难，却从未停歇。

从英国的议会革命到南非的民主转型，从韩国的公民运动到东欧的和平革命，人类一次次证明了改变的可能。

制度的力量来自人，而人类的创造力最终会战胜恐惧。

历史的教训并非绝望，而是警醒。它告诉我们：繁荣不是地理的礼物，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分配权力、建立信任。

——达隆·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

致谢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无数人的智慧与支持。我们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他们在讨论中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

特别感谢以下学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菲利普·奥雷亚（Philippe Aghion）、詹姆斯·费尔南德斯（James Fearon）、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他们的研究启发了我们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理解。

我们感谢编辑团队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的耐心与专业，尤其感谢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与克劳迪娅·戈德温（Claudia Goldwyn）。

此外，我们要向学生与读者致谢。他们在课堂、研讨会与通信中不断提问，促使我们把复杂的理论转化为清晰的语言。

最后，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给予我们时间、理解与温情，在漫长的研究与写作岁月中成为最坚实的后盾。

——达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
剑桥，2012 年